

总第34期  
2015年04期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抗战时期朱德爷爷在太行山上二三事

万民永忆女先锋——纪念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诞辰110周年

# 四川党史

SICHUANDANGSHI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准印证第01-012号



# 中共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举行 省委书记王东明作重要讲话



7月7日至8日，中共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在成都举行。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摄



省委书记王东明作重要讲话。四川日报记者 毛漫丁/摄

中国共产党四川省第十届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2015年7月7日至8日在成都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6人，候补省委委员14人。省纪常委、有关方面负责同志、省第十次党代会代表中部分基层同志和专家学者列席了会议。

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王东明作了重要讲话。第一次全体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方式扩大到各市（州）、县（市、区）。

全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分析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面临的形势任务，对新阶段我省扶贫开发攻坚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审议通过了《中共四川省委关于集中力量打赢扶贫开发攻坚战，确保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

## 四川省中共党史 教育基地掠影



中共成都历史展览馆



红军长征翻越夹金山纪念馆

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牢记中国人民为维护民族独立和自由、捍卫祖国主权和尊严建立的伟大功勋，牢记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珍视和平、警示未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万众一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习近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场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开始得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是二战的主战场之一。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而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川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无论兵源、粮源的供给都居全国之冠。特别是当时的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四川成为全国正面战场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因此，四川也被日军作为大轰炸的重点地区，损失和牺牲极为惨重。但四川人民冒着空袭的威胁，顽强坚持生产，积极支援抗战，为抗战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

中共四川组织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指挥下，加快恢复重建和壮大地方党组织，领导广大群

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大力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整个抗战时期，中共四川组织根据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合四川的抗日大后方特点，广泛动员民众，争取地方实力派坚持抗战，做了大量工作。在党组织的努力下，推动了川军出川参加抗战，宣传动员和组织了广大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加入敌后战场抗击日军侵略，涌现出许多视死如归的抗日典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并最终取得胜利，洗刷了中华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历史告诉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命运所系，前途所在。

今天我们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警示未来！

# 四川党史

## SICHUANDANGSHI

2015年04期

/总第34期

### 主管主办: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名誉顾问:

谢世杰 秦玉琴 陶武先 席义方

### 顾问:

陈荣仲 吴得民 卢耸岗 陈文书  
赵庆东 罗宗荣 张继禄 彭亚新  
龚自德 王庭科 彭穗宁 王光华  
侯德邻 张国新 鲜于浩

### 编辑委员会

#### 主任:

王承先

#### 副主任:

李文星 江红英 郭生春 宁志一

#### 委员:

周锐京 戴忠东 王 皓 杨吉成  
魏家骏 彭本瑜 邱 俊 江红颖  
谭洪明 唐广生 向道泉 余崇威  
雷家兴 唐宗政 李 勇 侯立新  
蒋吉平 师 伟 徐永利 秦后权  
肖 飞 张 敏 尹克发

### 封面:

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 封二:

- ①中共四川省委十届六次全会举行  
省委书记王东明作重要讲话
- ②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掠影

### 封三:

- ①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吕世光一行来川指导工作
- ②南充市举行朱德故居纪念馆“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 封底:

达州市宣汉县洋烈新村水乡小镇

## 卷首 01

### 本刊特稿

- 04 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的  
作用与贡献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专题

- 13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 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范斌

### 领袖风采

- 15 抗战时期朱德爷爷在太行山上二三事  
/刘建

### 专题研究

- 19 用笔锋点燃抗日救亡的烈火  
——略论《大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杨萍

### 学术动态

- 26 谈《四川知青史》研究与撰写思路 /孙成民

### 人物春秋

- 30 万民永忆女先锋——纪念抗日女英雄赵一曼  
诞辰110周年 /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 史海钩沉

- 36 “莫忘四川”七十年后今又说 /王皓

## 口述回忆

- 29 编写党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根本原则  
——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廖志高谈四川党史工作  
/陈文书

## 资料征集

- 42 周总理和一位旺苍籍老红军的故事 /蔡勇 张法祥

## 诗画党史

- 41 纪念碑  
——写给抗日战士 /唐维扬
- 41 白山黑水上空的一场大雪  
——致赵一曼烈士 /张合

## 红色之旅

- 46 赵一曼纪念馆 赵一曼故居 赵一曼牺牲地

## 动态窗口

- 48 四川省举办全省党史业务培训班  
四川省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乐山巡开展展  
原省委老领导沈国俊接受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访谈  
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  
中共绵阳历史展览馆正式开馆  
广元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党史图片开展展  
雅安市首批授牌8处“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刊名题签: 何应辉

### 编辑出版:

《四川党史》编辑部

### 责任编辑:

蒲志明 马睿 李晓聪

### 美术编辑:

《廉政瞭望》杂志社

● 地址:成都市青羊区商业后街3号

● 邮编:610031

● 电话:028-86603140

● 传真:028-86603140

● 电子邮箱:scds.2007@163.com

● 网址:www.scds.org.cn

● 准印证号: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第01-012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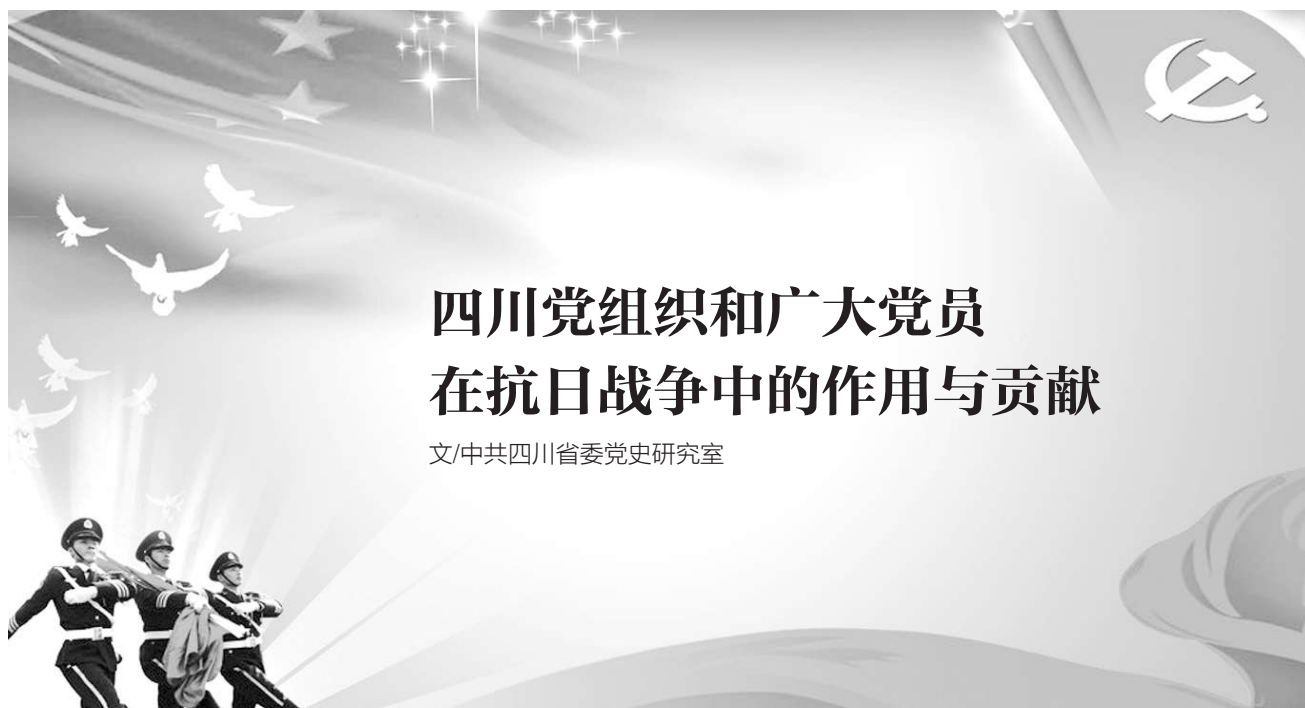
● 印刷单位:四川川林印刷有限公司

● 印刷日期:2015年8月

● 印数:4000册

● 发送对象:中央党史研究室,全国  
各省(区、市)党史工作部门,全省各  
级党史工作部门,省级各机关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四川党组织和广大党员 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与贡献

文/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人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新起点。中国共产党发起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重要作用。四川是这场长达八年的反侵略战争的大后方，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周恩来同志曾用四句话高度概括四川的重要作用，即：抗战最后根据地；联结西北和西南的枢纽；两个民主运动中心；坚强的战斗的西南党组织。正是由于抗战时期四川所处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中共四川组织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带领全川人民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加强自身建设，推动全省抗日进步力量中心的形成和壮大

要成为抗战时期的战斗堡垒和全省抗日进步势力的中心，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党组织本身必须

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发展壮大。而在土地革命时期，四川党组织历经磨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遭受严重损失。1935年6月，中共四川省委遭到破坏后，党组织统一领导的的活动基本停止。至1937年七七事变前，全省党员数量只有100余人，他们没有统一的省级领导机关，互不相属，零星分布在成都、重庆、宜宾等地。

党中央十分关注四川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早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上海局就派张曙时到四川开展工作。1937年夏，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延安听取张曙时关于四川统战工作和组织情况的汇报后，决定派张曙时为中央特派员，仍回四川发展党的组织。1937年6月，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泸县中心县委书记的邹风平到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四川党组织遭受破坏的情况。通过各种途径，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对当时四川形势的发展、对四川党组织的基本情况与发展趋势有了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与判断。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为中共四川组织的恢复重建创造了条件。针对全国形势的发展和四川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中共中央指出：四川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很快就会成为全国

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重点和全国的政治中心。因此，应迅速加强四川党的工作。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亲自关心和指导下，中共四川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1937年9月，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四川做公开统战工作的罗世文从成都到陕西，在西安写了入川报告，对四川统战工作和中共地方组织的重建向党中央提出建议。10月，张闻天、李富春代表中央找邹风平和在延安中央党校任总支书记的廖志高谈话，告诉他们中央决定派他们到四川重建党的组织，要求他们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为加快四川工作步伐，中央还决定派于江震、王子模等川籍党员和邹风平、廖志高等一同回川工作。11月28日，邹风平、廖志高等一行6人带着中央的重托离开延安回四川。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与张曙时、罗世文接头展开恢复和重建四川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1月10日，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工委”）在成都正式成立，邹风平、廖志高、张曙时任省工委委员。最初成立的省工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长江局成立后改由长江局领导，南方局成立后则改由南方局领导。省工委主要活动包括恢复和发展中共四川各级基层组织、进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加强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

1938年5月，省工委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和长江局关于“大量发展党员，不要搞关门主义”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都把发展党员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使各级地方组织和党员队伍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为完成此项任务，省工委对工委机关和各地党组织进行全面调整，分别成立了成都、重庆市委，撤销川北工委，建立南充中心县委和阆苍南中心县委，撤销川南工委，分别成立泸县中心县委和宜宾中心县委。在过去没有党组织活动的地区，也派人前往建立组织，发展党员。在省工委领导下，全省各地党组织和党员迅速行动起来。他们深入工厂、学校、军队和各

抗日救亡团体开展工作。一方面组织工人、学生和进步青年以及广大市民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一方面对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帮助教育，吸收他们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8年11月，四川从1938年3月底仅有的340余名党员发展到3250多人。党直接领导的进步团体19个，团结和组织的群众2400多人。

经过努力，四川地方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不仅党员人数有了大的增加，组织机构也更加完善，至1938年10月，建立了成都、重庆、自贡3个市委和宜宾、泸州等7个中心县委，从而使党的基层组织遍及全省各地。

中共四川组织的重建和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的坚强的政治领导力量，也成了大后方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这引起了国民政府与蒋介石集团的警觉和注意。1938年10月底，武汉会战结束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四川成为各种政治势力活动的中心舞台，处于支配地位的国民党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政策，大肆破坏中共组织，抓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接连掀起反共逆流。1940年3月，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嫁祸于中国共产党，逮捕了中共代表罗世文和著名进步文化人士车耀先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致使四川中共组织的活动空间被进一步打压。

在此情形下，中共四川组织审时度势，认为“四川党的建设已初步完成。但三四月来发展太快，新党员对党的基本知识还远远不够，党的基础不算稳固”，决定“以后组织方针是巩固与发展同时并进”。这一时期，四川党组织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和巩固党组织、巩固党员队伍的措施：

首先，根据形势发展，对党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1938年11月，省工委撤销，分别建立了川东、川西（1939年1月西康建省后改为川康）两个直属南方局领导的特委。其中，川东特委领导重庆、川东、川南之宜宾、泸县等地的党组织及1500多名党员，廖志高任书记；川康特委领导成





1946年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前排左二）、董必武（前排左三）与红岩村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合影。

都、川西、川北和川南之自贡、内江、乐山等地的党组织和1800多名党员，邹风平、罗世文先后任书记。

其次，加强党员的培训和教育。由于大批的新党员加入，如何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成为四川党组织面临的极为重要的任务，也是完成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必须解决的问题。为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增加党员知识，提高党员的工作能力等，省工委首先从思想教育入手，决定由省工委宣传部和成都市委部分成员，组织成立专门的教育委员会，举办党员短期训练班，要求各级党组织选派党员参加培训。

再次、号召全省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普遍深入农村、工厂、学校做群众工作，发展党组织。提出，工人运动以重庆、自贡、乐山、泸县、成都、顺庆（南充）为重点；农民运动以川东梁山、达

县、万县，川南的荣县、威远、宜宾，川西的成都近郊，川北的阆中、苍溪、南部为重点；青运以学生为主要对象，成、渝为中心；妇运“应在女学生与农妇两方加紧努力，有女工的地方亦应特别注意”。“由这些群众工作开展来扩大党的组织”，取得了明显成果。四川党组织这一时期的组织建设与发展工作，曾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表扬，称赞：党的工作路线以浙江、广东、四川等省为好。

至1941年1月，以皖南事变为标志，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内出现了新的极度严重的白色恐怖。面对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共四川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荫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把已暴露的干部撤退到偏僻的、特务不注意的地方找职业，代之以新的未暴露的干部；各级领导机关切实把握短小精干的原则；在特务严密监视的部门中，不建立支部，党员独立活动；把党和群众工作的中心，尽可能地放在利用社会习惯、政府





**罗世文 (1904-1946)**, 四川威远县人。全面抗战爆发后, 罗世文受党中央派遣回四川, 先后担任中共四川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川康特委书记、四川省委书记、八路军成都办事处主任、新华日报成都分社社长。在1940年3月国民党阴谋制造的成都“抢米事件”中, 被捕, 长期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内, 1946年10月被杀害。



**车耀先 (1894-1946)**, 四川大邑县人, 中共党员。1929年5月, 车耀先以经商为掩护, 从事革命工作, 在三桥南街创办了“努力餐”, 并于次年5月搬迁到祠堂街。从此, 这里成为中共四川省委一个秘密的党组织联络点, 车耀先在这里创办救亡刊物, 宣传抗日, 传播革命。1940年3月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1946年10月被杀害。

法令与合法组织方面, 以密切同群众的联系。通过上述措施, 中共四川组织将党的力量深藏于群众之中, 保存了党的组织和骨干力量, 从根本上锻炼了党组织, 并在复杂环境中逐步学会如何更妥善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

总之, 作为全省抗日进步势力的中心和中坚力量, 抗战中的四川各级党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 努力加强自身建设, 坚持抗战、团结、进步, 反对投降、分裂、倒退, 积极领导和组织全川广大党员投身抗日救亡图存, 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 二、加强上层统战工作, 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 是争取民族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1935年华北事变, 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 中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尤其重视和加强对四川实力派的统战工作, 对手握兵权、主政四川的刘湘等人作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抗战前, 朱德曾写信给杨森、邓锡侯等, 呼吁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1935年张曙时受中共中央上海局指派来川开展统战工作, 密切与四川知名人士的沟通。根据当时形势, 张曙时制定了推动上层转变, 促进刘湘反蒋抗日的斗争方针。经过不懈努力, 中共对四川实权人物的统战工作取得重大进展, 刘湘等实力派人物逐渐转变了政治态度, 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共同抗日的主张, 表示愿意率领川军出川, 积极投身抗战第一线。

1937年8月4日, 刘湘在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时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 主张坚决抗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听了刘湘的发言, 对其爱国热情表示赞赏, 约定双方互派代表加强联络。嗣后, 中央派李一氓、罗世文到成都做联络代表, 进一步在川军及各界上层开展统战工作, 刘湘派王干青做联络代表常驻延安。李一氓、罗世文临行前, 毛泽东亲自指示: 刘湘在四川实力派中军队最多、武器最好、实力最强、影响也最大, 做好刘湘的工作, 四川抗战的局面就可观了。四川实力派对蒋介石集团进入四川既有戒心又十分无奈, 他们既害怕蒋介石对自身的排挤, 同时难以抗拒中央军的强大实力, 又有联合中共抗日的强烈愿望, 这为中共在四川组织统战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能性。罗世文到四川后, 给刘湘带去了毛泽东给刘湘写的亲笔信和刘湘派驻延安的代表王干青写的介绍信。罗世文还带去了朱德、刘伯承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分别给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等川军将领写的信。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四川地方党组织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 加上社会各界的呼吁和努力, 终于使四川地方实力派逐步改变了看法, 了解并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1937年9月, 首批川军出川抗战。此后, 在八年抗战中, 共有300多万川军将士奔赴前方, 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以打内战著称的川军出现如此大的转变原因有许多,

但其中不容忽视且非常重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中共四川组织和广大党员在促成川军停止内战、出川抗日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推动和影响作用。

1937年7月21日，“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简称“省抗”）正式成立。“省抗”虽然名义上仍属国民党省党部统一领导，但实际领导权掌握在共产党员和各界进步人士手中。他们利用这个合法组织形式的有利条件，广泛发动和组织民众，促进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向前发展。1937年8月2日，“省抗”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发动全民族对日抗战，厉行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保全领土，肃清汉奸，巩固后方，武装民众，并要求刘湘亲率川军出川抗日。8月7日，“省抗”组织成都市民10余万人在少城公园召开大会，发出通电重申8月2日通电主张。大会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气氛之热烈，是抗战爆发后空前的。“省抗”成立后，全省各地也陆续成立了领导成员大多为民先队队员和进步人士的分会，各界抗敌后援会、四川青年救国会、学生救国联合会等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成立。

以“省抗”的成立和1937年9月刘湘亲自率部出川抗日为标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四川正式形成。

1938年初刘湘在武汉病逝后，中共四川组织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继续与其他四川地方实力派密切联系，争取他们对四川抗战的支持，积极开展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人的统战工作，使他们始终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如刘文辉的军师和助手、川军将领张志和曾在延安受到过毛泽东的接见，后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任中央委员，成为中共联系四川实力派的桥梁和纽带。后，八路军与刘文辉二十四军达成抗日合作协定，王少春等3名中共党员携带电台到雅安，帮助刘文辉建立与延安的直接联系。因此，抗战初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四川地方实力派表现出开放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姿态，这对中共四川组织领导全省民众蓬勃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客观上提供了有利条件。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

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此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中共四川组织在南方局的领导下密切注视着政治局势的变化，并努力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不断将搜集的情况向南方局汇报，南方局也及时指示四川党组织作相应的应对。1940年3月，国民党在四川制造了旨在打击中共四川组织和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抢米事件”，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四川党组织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特别是周恩来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迅速撤退党员干部的同时，努力做好地方实力派的工作，通过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高举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在避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的前提下，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 三、加强各种形式的宣传，推动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

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早在上世纪初，面对日本侵略者咄咄逼人局面，中共四川组织就曾领导成都的工商农教等各界人士在1931年9月5日召开“四川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开展系列抗日救亡运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由此兴起。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激起四川人民的强烈愤慨。1931年9月29日，四川各界300多个团体、5万多人在成都少城公园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日大会，会后各种团体深入街头巷尾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四川迎来第一次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2年4月8日，中共四川省委制定了“组织红五月各纪念节具体工作计划”，决定“五一”、“五四”、“五卅”等纪念日都要组织飞行集会、公开演讲，演反日新剧，印发宣言和传单，以激发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同年8月1日，中共四川省委指示各级组织准备九一八事变周年纪念，尽量动员广大群众及其组织，利用公开与半公开的群众组织，成立“九一八周年纪念会”，进行广泛的宣

传鼓动工作。9月18日，由“抗日大会”发起的“九一八国难周年纪念大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了“通电全国一致反日”、“反对不抵抗的军阀，实行对日宣战”等4项提案。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组织20多个宣传队深入进行宣传。

尽管四川救亡运动一直在中共等领导下积极开展，但是鉴于当时国内新军阀混战和国共对立的基本格局，以及蒋介石和四川地方军阀对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镇压，1935年之前这些救亡运动未能成为主流运动。

1935年发生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威胁，全国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再次兴起，四川人民积极响应，成都学生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声讨国民政府对日寇的一再妥协。1936年8月，日本政府妄图在成都设立领事馆，激起四川人民的反日怒潮，终于爆发“大川饭店事件”。受中共中央指派在成都做上层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张曙时，通过进步人士黄慕颜给省主席刘湘出谋划策，一针见血指出此事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造成的，责任应完全由日本人来负。在全川和全国人民的支持下，刘湘顶住了日本和南京政府的压力，妥善处理了这一事件，日本在成都设立领事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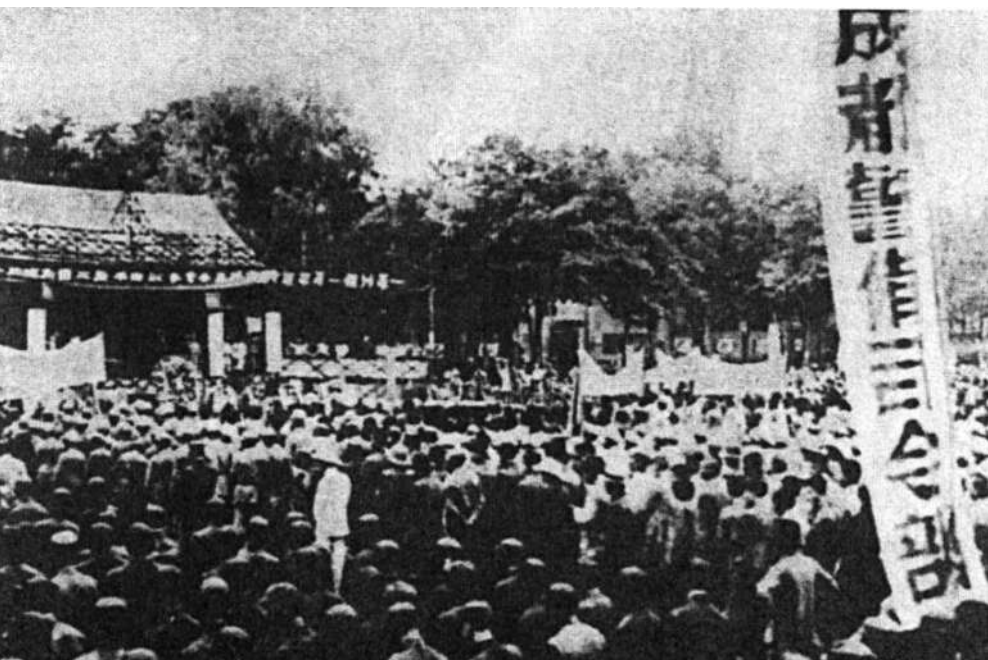
并企图作为侵略中国内陆桥头堡的如意算盘最终化为泡影。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英勇抗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天下午，以中共领导的“民先”成员为骨干的天明歌咏团一接到消息，立即高举团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上街游行，反映之敏捷，行动之迅速，为全川之首，全国罕见。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原来秘密建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成都学生救国联合会”、“重庆救国会”等团体，先后公开活动，抗日群众团体纷纷成立。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全国各界抗敌救国会等抗日团体、抗日报刊社先后迁到重庆，各界民主进步人士相继来川，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有了新的发展，

中共四川省工委成立后，通过下设的学委、文委、妇委成立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直接领导了全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如1937年9月成立的四川青年救国联合会在1938年2月划归省工委学委领导，发展成为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学生抗日救亡团体。此外，党组织还将一些党员派到抗日救亡团体中，影响抗日救亡运动。如在全面抗战爆发前

成立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即由共产党员车耀先和韩天石等人发起，具有广泛的政治基础和合法地位，能在一定程度上把当时成都的抗日力量统一起来，为当时单独活动的共产党员及其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队”）的活动，开辟了一个同社会各阶层广泛联系、发动群众实现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的工作阵地。

全面抗战爆发后成立的在全省具有相当影响的“省抗”及其各级组织，共产党员、“民先队”领导和骨干均进入领导机构，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省



1939年7月7日，成都各界民众3万余人在少城公园举行抗日救国纪念大会。



抗”的下属组织也多为“民先队”队员所掌握。

中共举办的各种宣传杂志和报刊，在四川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舆论导向作用。当时，宣传抗日救亡的主要途径是报刊杂志。《四川日报》从重庆迁到成都后，党组织就派了一批党员到报馆当校对工、编辑和经理，并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成都，《四川日报》立即发表社论《为二十九军英勇抗战，谨致以民族的敬礼》，接着数日连续发表《肃清入室之寇》、《整军与杀敌》、《全国总动员》等社论。共产党员杜桴生出任总编辑后，增辟了多种定期与不定期的救亡专栏。省工委成立后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

“《四川日报》主笔和编辑都是我们的同志，起了我们宣传机关的作用”。由共产党员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中共的全面抗战主张和路线，因此很快成为深受群众欢迎、影响较大、声望较高的一个刊物。川康特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说，《大声周刊》的“言论正确锋利，摆明了党的刊物的面目”。许多报刊，如成都的《蜀话报》、《新民报》、《时事新刊》、《学生新闻》、《新新新闻》、《华西日报》等，重庆的《新蜀报》、《国民公报》副刊、《生力军》、《青年生活》、《商务日报》、《齐报》、《人力周刊》、《春云》、《诗报》等，自流井的《正确日报》，宜宾的《边疆新闻》、《金岷日报》等，也都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或影响下，大力宣传抗日救亡。

由中共中央长江局（后南方局）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创刊后，中共四川党组织把巩固宣传阵地的重点转到对《新华日报》的宣传和发行上。四川设立了《新华日报》分馆和印刷厂，各地设立《新华日报》代派处。省工委下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以及抗日救亡团体中的积极分子，普遍订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经常学习讨论重要社论和重要文章。成都的《新华日报》代派处不断扩大，先后改为分销处、西北总分销处、营业分馆，由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领导，成为省工委的对外联络机关。

除了报刊杂志，四川党组织和党员还采取多种

形式宣传抗日救亡，推动坚持抗战、反对投降的斗争。如通过各抗日救亡团体成立各种宣传队、宣传团、歌咏队、电影队，深入街巷、工厂、农村、学校，扩大抗日宣传。宣传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广为散发石印、油印传单资料，办墙报、壁报，书写抗日的宣传标语等；或举办训练班、演讲会、讲习会、读书会、夜校、研究会，宣传抗战，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宜宾党组织领导了有400余人参加的“宜宾县抗敌晨呼队”，晨呼队员在清早商店开铺之前，集合游行，沿街高呼口号，高唱抗日歌曲，并辅导街道办壁报和建立乡间晨呼队，开展募捐活动，慰问抗战伤兵及被日机轰炸的死难同胞家属。中共内江特支领导了拥有100余人的内江兴华剧社和“孩子剧团”，在内江甚至在全省各地巡回演出，为抗日救亡奔走呐喊，影响很大。此外，各地党组织还特别注意利用国民党的机构、团体进行宣传活动。如万县党组织以国民党名义到各县农村宣传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思想，通过特殊关系，进入国民党当局举办的集训班，向参加集训的保甲人员宣传《论持久战》，并把《论持久战》列为万县地区学生战时训练团的主要教材。

皖南事变后，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中共斗争策略转向文化斗争为主，戏剧成为最富战斗力的武器。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四川党组织和党员协助党所影响和掌握的进步文艺团体排演话剧，上演了如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屈原》等一大批剧目，促进了各阶层民众的觉醒，喊出了人们坚持团结进步，坚持抗战到底的心声。

## 四、四川共产党人身先士卒，英勇投身抗战最前线

中共四川组织努力推动全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广泛深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积极动员广大青年参军入伍，支援前线。仅阆中县党组织就动员与输送了5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去延安。他们到延安后，通过培训与学习，除少数留地方工作外，大部分加入八路军队伍参加对日作战。而在敌

后战场，以共产党人为代表的川籍英豪更是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直接奔赴抗日前线参加对日作战，充分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他们中，有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师政委邓小平，八路军115师政委聂荣臻，新四军军长陈毅，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罗瑞卿，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等。这些川籍共产党高级将领，率部不畏强暴、奋勇拼杀，与凶恶的侵略军进行了无数次殊死血战，直至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朱德总司令在指挥部队抗击日军之余，还特别关心家乡情况，希望有更多的四川青年积极投身抗日第一线。1937年9月27日，朱德在家书中写道：“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耐劳之人无妨多来……以好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消息传出，仪陇一批青年奔赴太行山区参加了八路军，如仪陇籍战士陈学陶，1939年从炮兵技校毕业后，历任炮兵团排长、连长、营教导员等职，在太行山区参加过数十次战斗，在“百团大战”中立功，被晋升为山炮大队大队长；仪陇籍战士黎德祥，模范完成各项任务，后任八路军山西、河南先遣队司令部电话班副班长、班长、排长、通讯参谋、第五军司令部架设干事、第八军电讯局局长，每次战斗中，他都及时、正确无误地完成了通讯任务，还在“百团大战”等著名战斗中立功受奖。

在抗日正面战场，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同时又是共产党人的为国捐躯的四川籍烈士，如在常德会战中阵亡的柴意新烈士和在淞沪会战中殉国的解固基烈士。柴意新将军是四川省南部县人，在中共四川省军委书记李鸣珂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柴意新率团在常德守卫战斗中顽强抗战，誓死如归，最后壮烈殉国。四川省人民政府1985年5月追认柴意新为革命烈士。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柴意新将军入选抗日英烈录。解固基将军是四川崇宁（今属郫县）人，1927年，经旷继勋（崇宁县驻军

团长，中共地下党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淞沪会战中，解固基将军率部英勇杀敌，壮烈牺牲。1986年，解固基被党和政府再度追认为烈士。四川渠县人郑少愚是国民党空军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党空军主力第四大队大队长。在抗日战争中，郑少愚参加了在广州、南京、武汉、贵阳、柳州、成都、重庆等地空战，只身击落日机五架，配合友机击落敌机数十架，共5次负伤，战机负伤30多次，多次受到褒奖。周恩来同志曾于武汉、重庆先后两次秘密接见他。1942年春率中国空军飞行员前往印度接收美国援助飞机，途经驼峰航线时飞机失事殉难。1981年11月27日，四川渠县人民政府追认郑少愚为革命烈士。

在川籍共产党人中，还涌现出了许多抗日革命英烈，赵一曼、陈修文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1905年生于四川省宜宾县一个小地主家庭。五四运动期间，赵一曼受到革命思想影响，在大姐夫、中共党员郑佑之办的学校里学习，懂得了要推翻封建势力的压迫，不仅要反抗它，而且要改造它。一九二四年初夏，她冲破家庭的牢笼，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1925年冬天，赵一曼组建了四川农村青年中最早的团组织——宜宾县白花场白杨嘴村团小组，赵一曼亲任组长。1926年，中共宜宾特支成立，赵一曼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为反抗日本侵略者，受党的委派，赵一曼到黑龙江省尚志一带参加抗日联军。她带领抗联战士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沉重打击了敌人。她在一次战斗中救战友时因身受重伤而被俘。敌人对她进行了一次次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但她始终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年仅31岁的赵一曼英勇就义。牺牲前，赵一曼在写给儿子的遗嘱中说：“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为国而牺牲”，这既是抗战先烈的崇高信念，也是四川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自我牺牲精神。四



赵一曼 (1905—1936)



陈修文 (1908—1942)

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以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随着正面战线内移的军民同胞，大半居于斯、食于斯、吃苦于斯……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的。直到抗战终止，四川的征兵额达到三百零二万五千多人；四川为完成特种工程，服工役的人民总数在三百万人以上；粮食是抗战中主要的物质条件之一，而四川供给的粮食，征粮购粮借粮总额在八千万石以上，历年来四川

川人民的好女儿、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品格，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陈修文，1908年生于四川南充嘉陵区大通镇一个耕读世家，1925年在南充中学组织“读书会”，中学毕业后回乡任教，1935年参加杨森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其高中同学、中共南充中心县委代理书记陈震的启发和感召下，陈修文脱离川军和舒适的生活，毅然赴延安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晋东南抗大五分校大队长等职。后到中共中央中原局从事地方工作，先后任阜宁县、阜东行署民政科长兼新四军射阳总队队长。1942年7月，当日军对新四军总医院进行“扫荡”时，陈修文在组织伤病员突围转移过程中壮烈牺牲。1951年3月被川北行署追认为革命烈士，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确定为革命烈士。四川人民的好儿子、共产党人陈修文舍生忘死、为国捐躯，蕴含了中华儿女的牺牲精神和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将永远被人民铭记和怀念。

1945年10月8日《新华日报》发表题为《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指出：“在八年抗战之中，

川贡献于抗战的粮食占全国征粮总额的三分之一，而后征借亦自四川始。此外各种捐税捐献，其最大的一部分也是由四川人民所负担。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现在抗战结束了，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激。”地处西南一隅的四川之所以能为抗战胜利做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是离不开中共四川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的艰辛努力和付出的。在这场伟大的反侵略战争中，四川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广大党员，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从民族存亡大局出发，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积极号召和组织青年奔赴抗日前线，推动了全面抗战高潮的形成。在抗战的各条战线，川籍共产党人表现了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川籍革命英烈展现了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崇高民族气节，他们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贡献。所有这些，都有力印证了中国共产党无愧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历史论断，这是四川近现代历史上光辉而重要的一页，将永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史册，值得全川人民骄傲和自豪。



## 培育全民法治观念 夯实法治社会建设基础

文/范斌

通过对我国30多年的法治建设基本历程的系统梳理、分析和总结，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全民法治观念深刻地影响着法治社会建设的进程及走向，培育和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是推动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前提和坚实基础，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由之路和努力方向。所以，贯彻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键点在于培育全民法治观念，重难点也在培育全民法治观念。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很多方面，厘清和明确各相关责任主体十分重要和必要。只要各责任主体尽职尽责，全社会齐心协力，全民法治观念就一定会与日俱增，早日形成。

**领导干部带头懂法守法是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关键。**自古以来，我国有着“以吏为师”和“上行下效”的传统，官员的一举一动都会被不同程度地放大而引领和影响整个社会。所以，培育全社会的法治观念，抓领导干部应该是破题之笔。“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只有领导干部真正懂法遵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实施领导和管理，才能消除一直以来的“官本位”思想，在其位谋其政；才能用好手中的权力，明白用权的界限，不触碰法律红线，不逾越法律底线；才能杜绝法外之权，彻底扭转官场风气，做到官员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进而带动全社会崇尚法治，形成法治观念和文化。近年来，官员的法治思维和能力虽然大大提高，但仍有一些官员“谈法治时滔滔不绝，做决策时权力滔滔”，实际上却做着与法治背道而驰的事情。一些干部和群众甚至认为全社会的法治

信仰缺失，官的问题大于民的问题。可见，当前领导干部知法守法的正面示范引领作用仍不尽人意。

**司法机关公正规范执法是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核心。**让公民信仰法律，法律须给公民以信心和力量，须保障公民的权利和尊严。生活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一个个“官司”，都是一面面法治的镜子，也是法治建设的一级级台阶。一次次实实在在的法律适用过程对公民法治观念的冲击和影响，远胜过千百遍的学习宣传和思想教育。公正和规范是司法的最高价值。执法机关和执法者必须站稳脚跟，挺直脊梁，铁面无私，公正执法，规范用法，正确对待每位公民的合法诉求，通过依法审理和判决，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只有这样，法治的精神、法治的意识、法治的观念、法治的文化才会深深熔铸于广大民众的心中，广大民众才会逐步地从内心深处真诚拥护和信仰法治。十八大以来的一桩桩错案的艰难纠错到沉冤得雪，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好评，这正是司法机关倡导正义、规范执法的结果，不断地给公众法治信仰输入了强大正能量，不断地为社会法治信仰大厦添砖加瓦。

普法部门创新宣传教育是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重点。法治宣传教育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促进公民法律意识形成的主要途径。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人们的信息传递和接收方式发生了极大改变，而一些通讯工具又使我们沟通联系更加便捷、快速、高效，如何不断更新和创新法治宣传教育的形式、方法、手段，增强法制宣传教育的纵深度，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

生动性和实效性，向我们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宣传、文化、教育等相关部门必须与时俱进，研究新形势，掌握新需求，树立新观念。要不断创新载体，研究和利用好微博、微信、微视和手机客户端等新兴媒体，不断实现宣传教育的多元化、开放性、生动性和及时性。要不断创新手段，深入推进“法律七进”活动，加大法制文艺创演力度，拓展群众创造法治文化、表现法治文化、参与法治文化的渠道，提高法制宣传教育的主动性、参与性、创造性和针对性。

**社会相关方面各尽其能是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保障。**全民法治观念的培育和形成，决不能单打独斗，还需要其他各方面的积极作为，承担起各自应有的责任。立法机关要广泛听取民意。加快民生领域、民生环节的立法工作，更加注重引入群众参与，通过网上公示、手机短信平台、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等多种方式，吸引老百姓的参与，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和呼声。学校要承担起教育责任。文化的养成不可能速成，必须从小灌输、教育、训练。学校应该把法治课作为必修课，让每个学生从小接受法治教育，增强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在法治文化的熏陶下健康成长。媒体要客观理性传播。媒体是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观念的重要一环。媒体要展示真相、客观表达、严守规则、维护公义，社会才能恢复理性、尊崇法治。另外，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需要宣传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需要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发挥积极作用；“建设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需要发展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业；“健全依法维权和化解纠纷机制”，需要政法、综治、信访、调解、仲裁等部门的协同支持。

**广大民众自觉用法敬法是培育全民法治观念的难点。**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治的主体，形成法治信仰的基础在广大民众，如果广大民众没有法治信仰，一个社会缺乏法治精神，法治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法虽立而难行。在缺乏法治传统的中国，非法治观念不仅十分深厚，而且存在面十分广泛，同时表现形式十分隐蔽。当前，许多非法治文化的现象和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人信钱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访不信法、信闹不信法；一些人以规避法律和钻法律空子为荣，以遵纪守法为蠢；一些人对违法犯罪行为，要么麻木不仁、姑息放任，要么起哄参与、趁火打劫；等等。所以，要在广大民众中和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远比一种制度的颁行或机构的设立更为困难。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每位公民首先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从具体行为习惯做起，真正把守法作为一种生活习惯和生活态度。推进全民守法，每个公民还要从遵守工作和生活中的每一个社会规则、乡规民约、市民公约、单位准则等开始，加强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把遵守规则契约和弘扬公序良俗作为讲文明的象征和有素养的表现。

总之，培养全体人民信任和尊重法律的思想意识，确立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观念，让法治成为全体中国人的最大公约数，让“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成为社会新风尚，任务异常艰巨，工作异常纷繁，但只要各个责

任主体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做好本分，各方面协同互助、齐抓共管形成合力，每个人锲而不舍、驰而不息践行推动，法治就一定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最终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核心价值，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力量和根本保障。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  
党史研究室）



## 抗战时期朱德爷爷在太行山上二三事

文/刘建

抗战爆发，朱德爷爷胸怀“与日寇决一死战”的钢铁意志，跃马挥师，驰骋于抗日疆场。从1937年9月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到1940年春离开山西返回延安，他在太行山地区领导华北抗战近3年。此间，他率领八路军总部和3个师的将士，首战平型关，奇袭阳明堡，伏击雁门关，侧击正太线，以劣势的装备抗击长驱直入、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杀出了军威，振奋了民心，稳定了华北战局，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野心与狂言。

抗战初期，朱德爷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东路军总指挥，在晋东南的国民党军队统归他指挥。康克清奶奶在她回忆录中专门讲述了她陪同朱德爷爷赴洛阳与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中央军卫立煌将军协调抗战谈判的过程。

“到了洛阳中央军司令长官部，卫立煌将军带着手下的将军和他们的夫人在门口迎接我们。朱老总上去同他们握手寒暄。当将我介绍给卫将军时：‘这是朱副司令长官的夫人康克清女士。’卫忙答‘欢迎，欢迎！’晚上，卫立煌将军为我们设宴接风，将军们都带了夫人作陪，只是未见卫将军的夫人，后来才知道他的夫人去世不久。宴会开始，卫将军起立为朱老总敬酒，然后说：‘为欢迎朱太太光临我们战区，我敬朱太太一杯酒。’我心里直纳闷，这朱太太是什么人？想必是他们另外请的客人，紧跟朱老总后边就给她敬酒，一定是位重要的



人物。刚才怎么没见介绍？这时卫将军举杯朝着我看。朱老总在我身边见我不动，用手捅我一下，‘人家给你敬酒，没听见么？’我这才明白过来，朱太太就是我，急忙站起来声明说：‘对不起！我们那边没有这种称呼。’说得全屋人都笑起来。卫将军一边笑，一边说：‘我们这里都是这个叫法。朱太太，以后你可别再闹误会喽！’当晚，我对朱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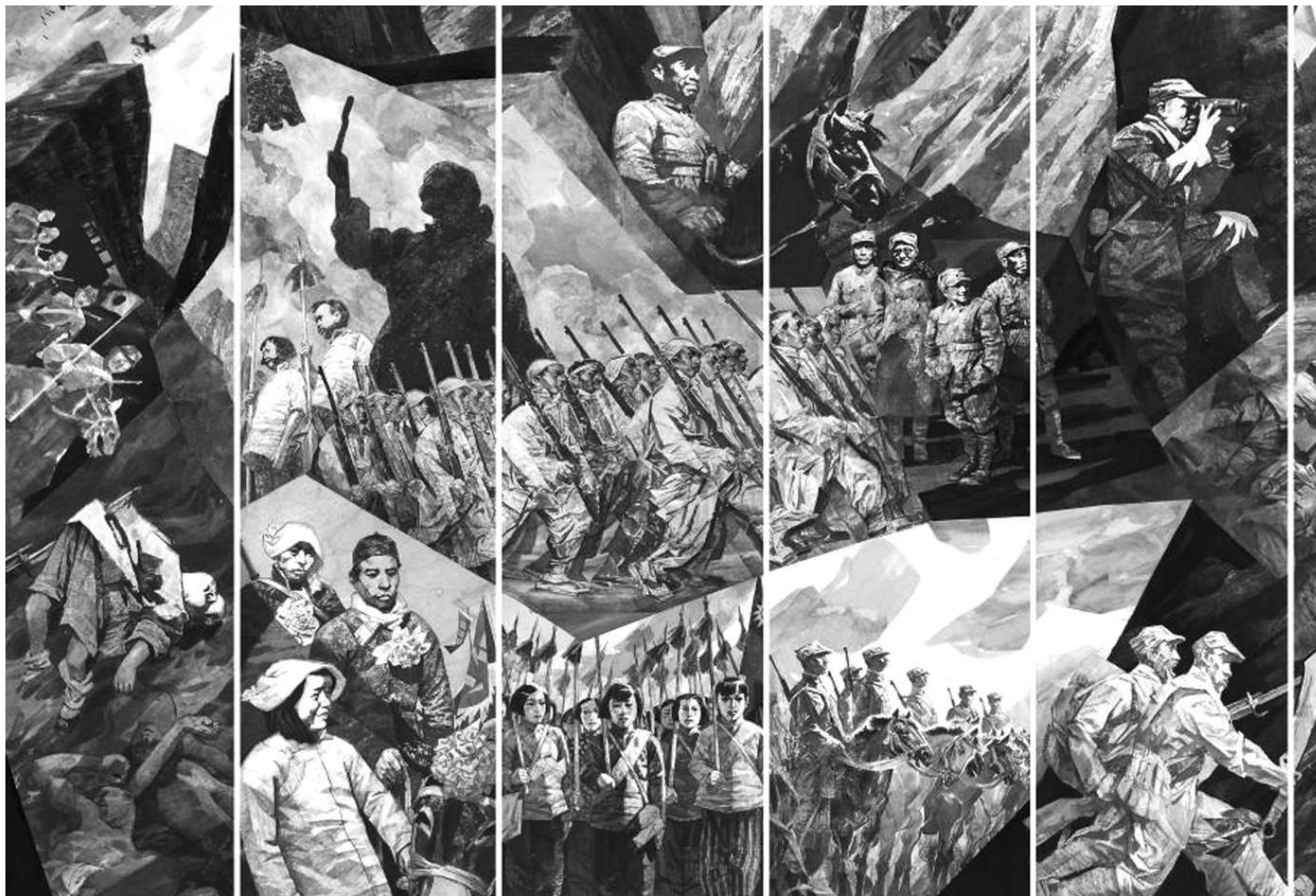


总说：‘听他们喊我朱太太，我周身都不舒服，别扭极了。’朱老总说：‘对嘛！干革命不当官太太，当官太太不革命。我赞成你这个思想，我不希望你只当我的太太。不过他们这里都是这个叫法，成了习惯，也只好入乡随俗了。’朱老总又说：‘我们到这里的生活习惯。只要不涉及原则立场，一切服从工作需要。’”

对于一些国民党将领对坚持敌后抗战没有信心，陷于彷徨与动摇之中，朱德爷爷在东路军将领会议上饱含民族激情地指出：作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要为民族解放流尽最后一滴血，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我们的选择是战略上的持久战，战术上的速决战。当时有的顽固分子指责共产党八路军进攻石友三、朱怀冰的军队，是制造摩擦、破坏抗日行为……卫立煌将军当时气得一拍桌子：“朱副司令长官亲自到洛阳来，是为了共同协商解

决问题，不允许你们胡说八道！”这才煞住了那几个人的气焰。随后朱德爷爷有理有据的说明了事实真相。通过激烈的谈判斗争，终于达成了几项协议：冀南豫北，国共两方驻军以漳河为界；八路军在中条山保留一条运输线，补发近年来扣发八路军每月六十万元的军饷。

朱德爷爷十分注意发动和武装民众的工作，他派八路军去组织地方游击队，太行山上到处都是“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生动场面。人民抗日武装和群众性游击战争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八路军主力部队日益壮大，1938年，在山西的八路军主力两次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出击，收复失地，八路军成为华北敌后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人们称赞朱德爷爷“敌后撑持不世功，金刚百炼一英雄。”日军闻知心惊胆寒。



在率领八路军与日军艰苦作战中，朱德爷爷坚持和战士们一起过着节衣缩食的艰苦生活。敌后抗日根据地生活本来就很不艰苦，国民党政府停止了八路军的供给后，困难就更多了。康奶奶回忆说：我们一边战斗，一边用自力更生、加紧生产的办法来克服困难。朱德爷爷为此写了一首诗《寄语蜀中父老》：“伫马太行侧，十月雪飞白，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诗中豪情歌颂了八路军战士奋勇杀敌的英雄气概，形象地描绘出八路军战士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朱德爷爷最初把诗给几个参谋和秘书看。第一句原是“饮马太行侧”，大家觉得“饮马”更意思贴切，先改“驻马”，又经斟酌推敲，改作“伫马”。第三句原为“战士怯衣单”，也觉得与战士的艰苦奋斗精神有距离，经大家研究，改作“战士仍衣单”。改后，朱德爷爷重复一遍，高兴地说：“还是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一改，完全符合我军战士的实际了。”

王家峪一带是个贫困山区，这年又旱，入冬以后极少雨雪。开春后，旱象已成。地方党委和农救会号召担水浇种玉茭。八路军总部机关也抽时间支援群众抗旱，帮助担水栽种，朱德爷爷听说，也抽空赶来，大家说他年纪大，不让他挑水，让他干轻一点的活。他抢过水桶，担了一个多钟头的水，才又回去工作。朱德爷爷还发现驻地有个叫刘瑞林的老汉，孤身一人，玉茭种不上，正在发愁，就对他说：“老人家不要慌，保证你那一亩玉茭全能种上。”晚饭后，朱德爷爷带上身边工作人员，借来耕牛、犁耙，耕的耕，耙的耙，担水、点种，忙了两个晚上，帮他玉茭全部都带水种上。老汉高兴得满口感谢。为了减轻当地人民的负担，朱德爷爷带头，发动总部机关开

荒种地。入冬后，在蟠龙开出了一大片荒地，野战政治部在总司令的影响下，也在附近山坡上开出了一大片荒地，开春后全种上了庄稼。

朱德爷爷说：帮助群众要有长远打算，一个好办法就是植树造林。要向群众宣传，还要由我们八路军带头。他亲自选地方。王家峪村外有很大一块河滩地，年年闲着不用。因为离村子近，就选定现在这河湾地上植树造林。总司令一带头，地方党委又动员群众参加，很快就把那块空旷的河滩栽上小树苗。

如今，那些小树早已长大成材，其中朱德爷爷亲手栽的那株杨树已长成参天大树，有趣的是，人们发现，那棵杨树的枝条折断后，每根枝条年轮的中心都有一个小小的五角星，这种天工造化，使许多人惊讶不已。这棵树现已作为文物保护起来了。

凡是到过黎城县黄崖洞的人，无不为那里“仰望天一线，俯窥千仞壁”的山势而惊叹。黄崖洞是朱德爷爷多次亲自踏勘为八路军在敌后的第一个修械所选定的厂址。兵工厂开工后，朱德爷爷多次到工厂里看望工人，指导生产，部署防卫，对每个环节的问题都再三叮嘱，关怀入微。兵工厂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发展很快，由每月生产100多支步枪，装备一个新兵连，发展到一年生产的军火可武装16个团。黄崖洞兵工厂生产的武器弹药是八路军送给日本鬼子最好的“礼物”，日军视此地为眼中钉，图谋拔掉。然而经过朱德爷爷精心部署，这里变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在著名的黄崖洞保卫战中，总部特务团和兵工厂的工人武装打退5000名日军的进犯，创造了敌我伤亡6比1的辉煌战绩。

砖壁村的老人们都会背这样一首民歌：“抗日井啊抗日井，红砂甜水清凌凌；吃水不忘八路军呀，日夜想念朱总司令。”那是1939年夏，久旱无雨，土窑里积存的水也快用完了，朱德爷爷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第二天，他翻山越岭，勘察水源。一个小山洞里水汽升腾，朱德爷爷判定是打井的好地方，他召开总部直属机关打井动员会，讲道：“我们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要处处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为老百姓解决吃水困难。”在打井工





地，朱德爷爷、彭老总和左权副参谋长带领指战员热火朝天地干起来，终于打出了一眼13米深的水井。砖壁村群众眼见八路军在这干旱的山区挖出了第一眼水井，老乡们边品尝清冽的井水，边说：“俺山里人盖了龙王庙，建起了万圣厅，烧香叩头，祈祷神灵，可碰上大旱年头，万圣一个也不灵。咱朱总司令带领的八路军，可真比万圣还灵啊！”于是，砖壁村的群众给这口井起了个名字：“抗日井”。

康奶奶还回忆了在抗日战争中朱德爷爷惦念的两件家事。一件是1940年10月，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从成都找到了我的妈妈朱敏还有他的姨表妹贺高捷，一起送到延安杨家岭。妈妈那时已经14岁了，表妹13岁。妈妈的身体不好，得了淋巴结核病。延安的医疗条件差，为了治病，也为了能得到较好的学习机会，在延安住了一个多月，就把她和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王一飞烈士的儿子王继飞一起送往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朱德爷爷惦记女儿，给她写了一封信：

朱敏女儿：

我们身体都好。兹送来今年上半年的相片两张。你在战争中应当一面服务，一面读书，脑力同体力都要同时并练为好。中日战争要比苏德战争更迟些结束。望你好好学习，将来回来做些建国事业为是。

朱 德

康克清

1943.10.28 于延安

但因为邮路不通，信退了回来。康奶奶提议发个电报问问苏联政府朱敏的情况，但朱德爷爷不同意，说：“人家国家的安危是大事，我们儿女的安危是小事。”他言之有理，康奶奶也不便再说了。

康奶奶回忆的另一件家事是，“1944年3月，朱老总得到消息，他的生母在2月15日病逝了。他给我看了家乡的来信，好半天没有说一句话。我知道他内心十分沉痛。过了许久，他轻轻地对我说：

他的母亲生下13个儿女，只留下8个，其他的因为没法养活，生下来就被溺死了。因为大人要忙家里的活，小时候让他们自己在地里爬。他们吃的菜饭、红薯饭、杂粮饭，穿的是自家手工织的像铜钱一样厚的粗布。他家是个大家庭，母亲妯娌几个轮流煮饭。因为地主逼着退佃，1904年，一家分作两处，全家借钱供他一人读书。后来他当上旅长，才把借的钱还清。他的母亲一生劳动，老年还经常纺线，去世前一分钟还在做饭。她老人家是在锅台边倒下去的。”

朱德爷爷说：母亲不仅养育了他强健的身体，还交给他最宝贵的东西——与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30多年的革命军事斗争生活，他从未被困难吓倒过。还有就是勤劳刻苦的习惯和劳动的知识技能，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中从不感到劳累。母亲生前想见他一面，一直未能做到。朱德爷爷对康奶奶说：“这一生中如果说我有什么遗憾的话，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母亲去逝时，我未能在他老人家身边。”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要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就是要缅怀在中国革命斗争和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就是要坚持我们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代表的这一代伟大的革命者们历经艰苦跋涉、不懈探索，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开启了“中国梦”的第一章——解放梦，他们出生入死打天下，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率领全党全国人民走进了新时代，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全国人民，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续写了“中国梦”的第二章——富国梦；当前，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继续为“中国梦”的第三章——强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是朱德外孙、全国政协委员、解放军少将）



# 用笔锋点燃抗日救亡的烈火

## ——略论《大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文/杨萍

1935年，一二·九反日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后，四川的共产党员们纷纷行动起来领导和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员车耀先引导进步青年创办了《大声周刊》。《大声》周刊以“介绍现代化知识，讨论时事问题。站在国民立场，督请政府团结御侮，强化民族意识，拥护中央抗日救亡。大声疾呼，唤起民众，辅助教育，服务国家”为宗旨，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和欢迎，创刊不到3个月就发行了5000多份，被读者们视为“长夜的明灯”。《大声》周刊从1937年1月17日到1938年8月13日的一年半时间里，三易其名坚持发行61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四川影响最大的一份被川康特委评价为党刊的刊物。它用笔锋点燃了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熊熊烈火，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组织民众支援抗战，坚定了民众抗战必胜的决心。

### 一、《大声》周刊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应时而生，坚持斗争在抗日前沿

车耀先，1894年出生于四川大邑一个贫苦农



民家庭。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等职。他开办了“努力餐”餐馆作掩护，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车耀先以省立师范学校教师和“努力餐”饭馆老板的身份，团结四川军政界、教育界、文化界开明人士，开展救亡活动。他引导省立师范的学生周海文（周韧）、涂万鹏（王果夫）等，开展了一系列救亡斗争，这其中就包括创办《大声》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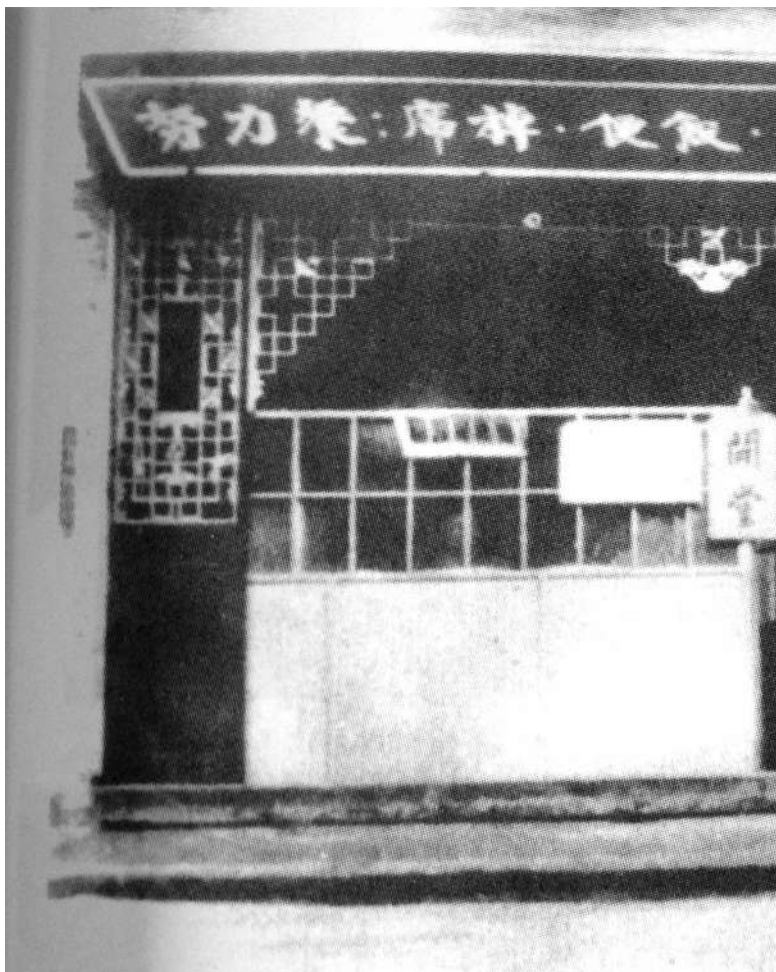
1936年12月初，在车耀先支持下，由韩天石（川大学生，共产党员）、周海文主编的民先公开刊物《活路》旬刊被强令停刊后。车耀先对国民党压制青年的爱国热情，“既不准他们起而行，又不许他们坐而言”的专制行为十分愤怒，鉴于“西安事变”发生后政治形势的复杂变化，决定在最短的时

间内出版公开刊物《大声周刊》。但车耀先知道，仅靠他个人的力量是办不起的，于是他向周海文提出，要求办《活路》旬刊的原班人马全部参加撰稿，就这样，以宣传抗日救国，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主的《大声周刊》于1937年1月17日在成都诞生了。

参加《大声周刊》筹备创刊的人中大多数都是正在读书的青年，因此，在社里担负《大声周刊》编务和出版发行的，只有车耀先、薛特恩和余路由（余耕义）3人。车耀先、薛特恩、余路由除了负责社务、编务、出版、发行、校对等工作外，还有写稿任务。车耀先主要在《大声》周刊各时期写“社声”、“社言”、“社评”，还在“读者之声”中答问，编“救亡情报”等。余路由则在“大众漫谈”中写文章，为其他版块写短论。韩天石、周海文、彭文龙等，还有最初作为自由撰稿人，后来成为《大声》党支部书记的胡景祥，则是《大声》的主要撰稿人。他们中一些人担负了固定专栏的写作，韩天石主持“通讯讨论”，彭文龙以“里奇”为笔名，为“常识讲话”写稿，周海文用牧人的笔名、胡景祥用列斯的笔名、张宣用羊角的笔名为《大声》“论著”、“专论”、“自由言论”等专栏写稿。他们不仅不拿报酬，而且当《大声》印刷费用不够时，还拿出自己的钱帮助印刷。正是在车耀先的带领下大家不辞劳苦积极办刊，才使得《大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崭露头角。《大声》一共出了61期，数百万字。期间数易其名，创刊时以《大声周刊》为刊名，编辑车耀先、发行薛特恩，社址在成都祠堂街努力餐，每期4版，设有社声、短评、时事评述、常识讲话等栏目。由于反响较好，《大声周刊》发行5期后更名为《大声》，仍以周刊的形式<sup>①</sup>在全川发售。每份售价二分，每周六出版，各埠大书店均设有《大声》周刊的代售处。

抗日救亡运动在冲破重重障碍中发展，而为抗日救亡助威呐喊的《大声》却遭到了顽固派的

打击。1937年4月17日，《大声》出版第13期后被迫停刊，在这一期停刊辞中编辑们无奈地写到：“国难已到最后关头，全国已到统一战线的时候；我们人民的步调要与政府一致，才能收团结御侮指挥意如之效！因此，政府既无条件的处分我们停刊，我们亦无条件的服从政府！”。反动派的迫害并没有让革命者却步，顽固派对《大声》等进步救亡刊物的极度恐惧和密切注视，反而证明了救亡刊物的重要作用。也让车耀先等共产党人更坚定了以《大声》作战场，以笔锋作枪炮，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决心。在车耀先、周海文等的努力下，停刊两个多月的《大声》改名《大生》后在五月继续出刊了。《大生》第一期，编者形容“伟大的战斗的被压迫民族的血淋淋的五





月，又悄然地到临了！正面迎着这沉痛壮悲的季节，蓬勃的‘大生’以崭新的姿态出现了。”在发刊词《五月之花》中，它坚定地写到“在目前救亡运动异常昂扬的高潮里，‘大生’，它是整个救亡巨浪中的一条支流，它要配合起每一点每一滴的救亡力量，它要毫无遗漏地接受救亡阵线的最高战术。”然而，顽固派对《大声》等救亡刊物的积极活动十分害怕，他们窥测时机，随时准备予以迫害。特务们更是对《大声》严密监视，他们在给省政府的密报中说：车耀先“组办刊物，借作宣传与喉舌（《大声》等）。其刊物中，每多反对与不满政府言论，并常转载共产党书记洛甫著作。经川省府将该项刊物查封后，庚即改名《大生》周刊（现仍发行）。当西安事变

发生时，车耀先尚以个人名义发表意见，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救国。自此，此辈比较明目张胆，到卢沟桥战事发动后，更形活跃。”<sup>②</sup>国民党当局很快发觉了《大生》是《大声》的“变种”和“伪装”，因此在《大生》第五期出版的6月5日晚上，即以“更名出版，言论更为荒谬”<sup>③</sup>为由，又一次下令查封。

车耀先等仍不屈服。他们再一次更名为《图存》，于7月9日正式出版。《图存》强调“团结御侮，救亡图存”是“全国上下一致的要求和共同的自觉”<sup>④</sup>。它在第二期上刊登的《日报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等文章，使四川人民认清了局势，更坚定了抗日的决心。《图存》出版虽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但此时蒋介石仍幻想求得“光荣和平”，而全国性的抗战尚未开始。因此，《图存》关于实现“总武装总动员全国民众对日抗战”<sup>⑤</sup>的呼声，自然要遭到国民党中央的取缔。7月24日《图存》出到第三期后，国民党当局又以“未经批准，违法出版”为借口，突然查封。《图存》被封后，车耀先等力争《大声》复刊。此时，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爆发，蒋介石发表了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全国性的抗日战争开始。于是，车耀先等一边开始《大声》复刊的立案工作，一边筹备复刊后的人员、选址等工作，11月5日《大声》复刊号正式出版。11月22日，车耀先等终于等到四川省政府编字第一六五号指令“姑准复刊”。《大声》复刊后，鲜明了自己的态度，它在复刊词中写道：“前因时局关系，曾演变化身；今天，又因时局关系，还我本来面目。面目虽然一样，态度却有不同。从前是大声疾呼：‘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今天要竭力呐喊：‘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为着：‘民族独立’，自然要展开抵抗侵略的解放战争；但同时，不进行‘民权自由’和‘民生改善’，这一战争是没有胜利把握的。”<sup>⑥</sup>当然的把争取人民抗日民主权利作为自己的任务挑在了肩上。接着，《大声》从





复4号到复6号，用三期全文连载了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文中“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因此，现在中国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加入抗日战线”更使民众了解了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

《大声》以及停刊再刊后的《大生》、《图存》、《大声》复刊号三易其名不惧迫害，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全民抗战、持久抗战的方针，努力用党的方针政策武装群众，始终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沿。川康特委在给党中央的信中高度评价《大声》周刊“言论正确锋利，摆明了党的刊物的面目”。

## 二、《大声》用笔锋揭露真相，坚定民众抗战必胜的决心

首先，《大声》在创刊之初以笔为枪，揭露“西安事变”真相，教育了民众，宣传了党的方针。

《大声》创刊正值“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当时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大量发布歪曲事实的新闻，广大群众对时局发展十分忧虑。为此，车耀先专门用自己的一台老式收音机收听和记录西安电台的广播，并收集和摘录外电报道，在《大声》上用大量的篇幅报道了“西安事变”真相。《大声周刊》创刊号发表的《宣传和谣言！》一文，把“西安事变”的经过，张、杨的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蒋介石的六项承诺等以新闻的形式如实告诉群众。以后，《大声周

刊》又陆续刊载了《双十二前张学良之请缨抗敌书》、《双十二张、杨对时局主张之通电》、《苏维埃中央政府、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西安事件提议召开和平会议通电》等多篇报道和文章，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破了国民党的谣言，对教育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其次，《大声》在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大声呐喊，旗帜鲜明地宣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卢沟桥事变消息传来时，原定7月9日出版的《图存》第一期已装订完毕。编辑们立即以“图存社”名义撰写了《以血肉的抗战答覆敌人底侵略！》一文，印成单页，在全城散发。文章中要求政府“立即总武装总动员全国民众对日抗战”。接着，《图存》第二期以《抗战！抗战！抗战！》的醒目标题发表社评，并刊载了《举国一致的抗战》、《目前国民大会应有的任务》、《对平津抗战应有的认识》等文章，要求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12月《大声》复刊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

针对统一战线内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的原则分歧，《大声》旗帜



鲜明地站在共产党的立场，大力宣传我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全文转载了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刊登了凯丰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等文章，有力地抨击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武汉出版的《扫荡报》，曾一度狂妄叫嚣要实行所谓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此，《大声》从复17号起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之进行严厉驳斥。车耀先在《不要中敌人的毒计——挑拨》的社声中指出：“我们抗战获得最后胜利的唯一条件，就是把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我们唯一的敌人。我们的抗战所恃者在此；敌的侵略所惧者亦在此”。而“一党专政问题的提出，其来源是否出自敌人不得而知，可是在客观上很有被敌人利用而施展它一贯的毒计的危险”<sup>⑦</sup>。孟西在《打击汉奸作用的谣言》的社声中强调：“向来为敌人所惯用而同时又是非常毒辣的挑拨离间——即以华制华的政策”。<sup>⑧</sup>

再次，《大声》全面报道沦陷区的真实情况，揭露了日军罪行，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

《大声》上还刊登了一系列反映沦陷区人民痛苦的文章，以大量的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去激发人民的爱国主义热忱。他们在《事实证明敌人之荒诞》中写道：“敌人所到之处，先以飞机大炮轰炸，继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暴行，尸体遍地、血流成渠，侥幸不死的，男的为其充当兵役、女的为其充当随军娼妓，人民当亡国奴之惨痛真是猪狗不如”，让民众读后无不咬牙切齿，誓要抗战到底。在《含泪话东北》的杂感中，他们对国民党“敦睦邦交”政策所换来的日本人“冀东自治”、“华北增兵”、“绥东侵略”、“武装走私”、“东北奴化教育”等事实，作了具体深刻的揭露。文中指出，如果继续推行这“敦睦邦交”的政策，这样的“友邦礼物”过不了多久全国人民都会尝到它的滋味了。《大声》还以诗歌、漫画、金钱板等生动活泼的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鼓动工作，很受群众的欢迎。《大声》虽然只发行了一年半

的时间，但却让四川的民众了解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抗战必胜的决心。

最后，《大声》对汪精卫等亲日派、汉奸的行为进行揭露，从多方面对抗战进行分析，鼓舞了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

对于国民党亲日派汪精卫之流，《大声》指名道姓地驳斥了汪精卫的种种谎言，《感谢汪先生的“救亡图存”之整个计划》、《希望汪先生继续主张抗战》等文对其的揭露、批判，提高了广大群众对亲日派的认识。为了让广大民众看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散布的所谓“和平”空气，《大声》具体地分析了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发表了《这就是中日亲善》、《杀人不见血的经济提携》、《显微镜下的中日贸易协会》等文，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为鼓舞广大民众抗战必胜的信念，《大声》从第4号起，长期连载《谁胜谁负》一文，从中日两国的军备、资源、财力、人力以及国际关系等多方面进行分析和对比，有力地驳斥了亲日派的“亡国论”，得出了“最后胜利绝对是中国的”结论。

### 三、《大声》周刊宣传党的政策，为党组织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车耀先的革命思想给了青年们巨大的帮助，《大声》在成为名副其实的旗帜鲜明的救亡刊物的过程中，锻炼了一批年轻的革命家、宣传家和理论家，使他们在战斗中迅速地成长起来。

首先，《大声》团结了在蓉的中共党员，为党组织的恢复积蓄了骨干力量。

1936年3月，由北平、山东、上海等地来成都的中共党员和民族解放先锋队队员韩天石、王广义（又名王路宾）等在开展救亡活动中结识了共产党员车耀先，成为《大声周刊》的主要发起人和撰稿人。他们利用自己“民先”队员和川大学生的双重

身份，在川大中团结了一大批爱国学生。这部分川大学生又在车耀先指导下，深刻领会了共产主义思想，更加深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大声》中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如经常给《大声》撰稿的周海文、彭文龙、张宣、涂万鹏等。一些隐蔽起来的党员在看到《大声》的文章后，也来到《大声》寻找组织关系，也使得《大声》团结了一批共产党员，为党组织的聚集了力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1937年11月，邹凤平、廖志高等6人受命回川恢复和重建党的工作。年底，车耀先经中央批准恢复了组织关系。不久，同为共产党员的编辑胡景祥也恢复了组织关系，之后，车耀先把《大声》交给胡景祥主办。胡景祥着手在“大声周刊社”中发展党的组织，组成了以胡景祥为书记的中共大声支部。《大声》等进步救亡刊物直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一批骨干分子，为党组织的恢复做出了贡献。

其次，《大声》刊登的理论文章，让更多的先进青年认识了共产主义，为党的恢复提供了后备力量。

为了让更广大读者认识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大声》专门开辟了“通俗哲学”专栏，让群众能够从中学习到认识抗日战争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特别是从世界观上给青年学生以正确的指导，让他们能够选择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道路。这一专栏在车耀先的指导下，既通俗又结合现实，他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用活泼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简洁明快的准确表述出来。受到了广大青年学生的欢迎，起到了很好的社会作用。除此之外，《大声》用较大的篇幅转载了中共中央公布的文件和中共领袖的重要讲话和文章。如毛泽东的《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八路军出师抗日誓词》、《毛泽东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

途》等。周恩来的《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目前抗战形势与坚持长期抗战的任务》和《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等三篇文章。以及朱德、洛甫（张闻天）、林祖涵（林伯渠）、罗迈（李维汉）、李富春、邓颖超等同志的文章和讲话十多篇，使更多的人了解了共产党以及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此外，《大声》还发表了宋庆龄、胡愈之、艾思奇、胡绳、邹韬奋、胡子婴、侯外庐、潘梓年、高士其等著名人士和学者的文章十余篇。特别是邹韬奋为《大声》撰写的《读二十条的主张》、《新的力量的迅速造成》，作为复9号和复11号的社声发表，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目。

#### 四、《大声》周刊积极动员、组织民众支援抗战

《大声》不仅用笔锋为抗日救亡大声疾呼，而且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首先，车耀先以“大声周刊社”名义筹备组织抗日救亡团体，支援抗战。

1937年3月14日，在车耀先的推动下，由“大声周刊社”等三十六个社会团体联合发起的“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斗争中诞生了，周海文作为“大声周刊社”和车耀先的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并被选为常务委员。“救国联合会”为成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卢沟桥事变”后，以车耀先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成都各界华北抗敌后援会”很快成立了。在“大声周刊社”和“救国联合会”的积极推动下，成都市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相继建立，有力地摧毁了国民党当局设置的道道堤防，使成都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1938年2月13日，中共四川党组织通过官办的省动员会出面，在少城公园体育场召开了《成都市反侵略运动大会》，省、市各界和抗日救亡组织都参加了。会上，车耀先代表各界民众、黄宪章代表文协作了



慷慨激昂的讲演。“成都反侵略少年团”的同志也代表少年儿童在大会上讲了话。《大声》复16期专门对此进行了报道，让这次大会和游行所搅动起来的“强烈的抗敌空气”传播的更远了。从1938年初起，“大声周刊社”还组织了时事座谈会，专题讨论了“如何开展成都的救亡运动？”、“如何保卫山西和武汉？”以及关于“一党专政”等问题，并将讨论的情况及时在《大声》上发表，团结了一批致力于抗日的各界人士。

其次，《大声》积极声援爱国人士的抗日救亡行动。

《大声》积极声援抗日爱国人士的救亡行动。1937年冬国民党政府导演的“稻草案”事件中，川大教授黄宪章无端被捕入狱，激发了成都文化界、新闻界对国民党顽固派的一致愤慨和对黄宪章的广泛同情。《大声》高度赞扬黄先生是“成都的章乃器”，指出逮捕黄宪章是制造的第二个“七君子”案件。为了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大声》发表文章要求政府公审黄宪章，让黄教授有公开申辩的机会，使事实真相大白于世。做贼心虚的国民党政府当然不敢这样做。黄教授在狱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坚定地表示：救亡无罪，政府如果继续压制民众运

动，这“将是抗战前途的一个莫大危机，中国对日抗战有无胜利的把握，唯一的要看我们发动民众而定”。

此外，“大声周刊社”积极动员组织民众进行募捐，支援抗战。

“大声周刊社”组织社员和民众为抗日将士及八路军积极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募捐活动，其一是发起募捐以购置“杀敌光荣”铜牌，组织慰问抗日将士及其家属。其二是组织“援助防毒”运动，动员社员和群众积极开展为八路军购买防毒面具的募捐活动。《大声》的号召，得到了广大民众的积极响应。在募捐活动结束后，《大声》及时公布了民众踊跃捐款的情况以及募捐的数字，对支援八路军抗战和扩大八路军在全国人民心中的影响，起到了积极作用。

《大声》虽然只存在了一年半的时间，但它引领了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让民众坚定了抗战必胜的决心，让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世人熟知，让党的周围团结起了一批骨干分子。《大声》在战胜重重困难后用笔锋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参考文献

- ① 此后略为《大声》。
- ② 成都市第一档案馆《“七·七”事变前后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档案史料选编》。
- ③ 《大声》复12号：《大声一年》
- ④ 《图存周刊》第一期：《发刊词》
- ⑤ “图存社”：《以血肉的抗战答覆敌人底侵略！》
- ⑥ 《大声》复刊号12号：《大声一年》
- ⑦ 《大声》复17号：《不要中敌人的毒计——挑拨》。
- ⑧ 《大声》复19号：《打击汉奸作用的谣言》。

## 谈《四川知青史》研究与撰写思路

文/孙成民



**编者按：**《四川知青史》是四川省社科院的重大科研项目，2015年7月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以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为背景，以当代四川的实践活动为基点，以党和国家对知青问题的基本结论、基本文献为线索，用大量的史实史料，系统展现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起始、发展、结束的全过程。该书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原党委副书记、研究员，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他曾在四川农村插队落户9年，又曾担任县委、地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及四川省委知青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兼省知青办副主任等职。对四川知青上山下乡这一特定时期的重大事件，他曾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现在又坚持数年、专注研究，成为其宏观把握发展历程、客观记述历史真实、全面再现本来面貌的重要基础与条件。

本文选自作者孙成民在《四川知青史》出版暨学术座谈会上的发言，供当代四川历史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参考。

### 一、关于总体思路问题

本书在“导言”中对此有明确的阐述，这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以新中国的发展历史和当代四川的实践活动为基点，以党和国家对知青问题的基本结论、基本文献，以及四川党政的知青历史文献为线索，客观展现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全貌和发展轨迹，系统梳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历程及其演变过程。既能有效存史，也能有助资政，还能有益育人，立足四川，缩影全国，借鉴历史，昭示未来，这就是作者研究与撰写的总体思路。

在研究中，作者坚持三条原则：一是坚持以历史文献为依据和线索的原则；二是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将事件置于特定历史范围之内进行考察；三是坚持忠于历史、客观记述、用事实说话的原则。

坚持这几条原则，核心是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从历史实际出发，客观运用史料，为世人为后代留下一部知青上山下乡的信史，为今后

深入研究中国知青问题及四川当代史留下一些有价值的史料。

### 二、关于研究视角问题

从宏观视角方面看，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尽管只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历史阶段的一个重要分支，但由于其持续时间之长、社会影响之大、复杂问题之多，已远超过同时期其他许多分支和事件。因此，将这一段历史史实放在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去考察，置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中去研究，这既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使然。

这里，有一个最核心的基本事实，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透过大量的史料发掘及历史真实的展现，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结论，就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研究与撰写《四川知青史》始终把握的宏观视角。

从基本视角方面看，四川知青上山下乡，离不开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环境，也离不开四川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独特背景。历史上的四川辖当今四川省与重庆市所辖全部人口和范围，可以说，四川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国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典型缩影。反映和展示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殊时期和环境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四川知青上山下乡，本身就有较大的难度，且有较大的挑战性。因此，本研究项目紧紧地以四川党政不同时期的上山下乡历史文献和知青工作决策为线索，以四川知青工作机构不同时期的主要工作为脉络，来全面地系统地展现这一段具有复杂背景及不同环境的知青上山下乡。

既然是以省的知青工作机构的主要工作为脉络，本课题涉及到的研究内容、范围、对象等决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全方位的、多层次的。因此，作者注意将四川知青上山下乡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来研究。从研究内涵来讲，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各个方面，还包括这些方面政策措施的制定、实施、调整、完善等各个环节；从研究对象来讲，既包括上山下乡知青这一主体，还包括与这一主体直接关联的他们的家庭、学校及社会；从决策实施来讲，既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及其工作部门，还包括城乡基层组织特别是农村社队组织等。以四川党政及知青工作机构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和主要工作为脉络和线索，来研究与撰写《四川知青史》，是作者始终把握的基本视角。

### 三、关于谋篇布局问题

时间跨度较长、历史背景复杂、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面宽，以及知青上山下乡的起伏发

展、矛盾复杂、工作棘手等问题，特别是离去并不久远的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是国家的历史记忆，而对每一个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来讲，更是一段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因此，在研究与撰写进程中，既要有历史感，从宏观的视角进行整体把握，又要有责任感，从微观的角度进行具体谋划。

本项成果对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是划分为三个阶段的，即“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主要是依托了这几个阶段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与中共党史、国史的相关划分是基本吻合的。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谋篇布局，本书在第一卷的“封底附言”中已作明确表述，这就是：“文革”前、中、后三个阶段的知青上山下乡是又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它们共同构成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全过程。这些不同阶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它们之间又不是没有区别甚至是重大区别的。看不到这些阶段的密切联系，或者看不到这些阶段的重大区别，都不可能正确地审视、客观地研究知青上山下乡的全部历史。

因此，《四川知青史》分立三卷，并将四川党政及其工作机构在不同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员、安置政策的制定与调整，知青教育、管理工作的现状与发展，重要会议、重大决策的出台与实施，重大事件、突出问题的显现与解决等，一一分门别类地展现在全书共37章、118节的叙述及200余张图片之中。这样的谋篇布局，既不游离主线又体现各自特点，既有骨架支撑又有实例衬托，以再现不同时期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来面貌。

为使全书脉络清晰、层次分明，本书在各卷末尾提纲挈领地作出“本卷小结”，并以“附录”方式列出若干综合性数据等，使本书的厚重感和史料价值得到增强。

### 四、关于研究方法问题

在运用史料和研究撰写的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法，辅之访谈法、个案法的方法。本书采取以编



年体为主的形式的同时，又结合“纪事本末”的体裁形式，对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记述。

如，知青的动员、安置、教育、管理、保护等，是贯穿上山下乡进程中始终的基本内容，不同阶段又有不同的特点与情况，因此在三卷本中每一卷都有这方面的章节加以专门叙述。而有所不同的是，后一阶段基本上是前一阶段这项工作的延续与发展，并显示出新阶段的不同背景与特点，其层次感应是较为明显的。

又如，知青上山下乡所牵涉到的各层级各领域的工作，既包括工作现状、进展成效，还包括突出问题、解决措施等。书中不仅反映出各级各部门对这项工作付出的极大努力及其取得的成效，而且展现这项工作在大历史背景和各地小环境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其中特别是各阶段都不可回避的诸如知青生活困难、住房条件较差、女知青受迫害等问题，以及不断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措施和工作力度等。不虚美，不掩过，用事实说话，如实记述，这是本书始终把握的思想方法。

再如，对贯穿上山下乡全过程的一些重要问题，为保持记述的完整性，本书在一些章节又以事件为主线集中专题材料进行撰写。如第三卷中的“知青婚姻问题的显现及困扰”“广泛开展知青慰问活动”“知青工作机构发展演变历程”“带队干部的制度与作用”等章节，以尽可能地集中展现这些问题发展演变的渐进性和完整性。

还如，对四川支滇知青情况的记述中，除在第二卷的“组织知青赴云南支边”外，还在第三卷专章记述“解决赴云南支边知青的问题”。由于是写“四川知青史”，本书不能过多地记述这一时段在云南发生的支边知青的若干重要事件，而本书则把重点放在叙述四川如何关注云南知青事件、如何率先提出解决回川方案，以及协调解决支滇知青返城的问题等。而这些问题也正是《四川知青史》应回答的基本问题。这方面的记述，恰好是众多记述云南知青问题的书籍及史料

中所没有的内容，也从另一侧面突显这些史料的珍贵。

## 五、关于回应热点问题

客观记述、不作评论，这是作者在研究与撰写《四川知青史》中遵循的一个重要原则。而按本书的总体构想，“导言”对研究与撰写的基本思路、背景及方法等作出必要的概述，“结束语”对意犹未尽的问题作出必要的阐释。因此，本书在“结束语”中，还有针对性地回应了当今社会较为关注的几个问题。

如，知青上山下乡的“初始动因”问题。本书认为，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其引发并持续近30年之久的初始动因，主要是“劳动就业安置”“培养接班人”“建设新农村”三个基本方面，并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决策意图及谋略轨迹上，进行了一番考察与分析。

又如，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的关系问题。本书的主要观点有二：一是认为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的产物，二是认为“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不是“文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在回答第二个问题中，本书又从知青“再教育”思想是否包含在“文革”运动的理论之中、“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是否包含在“斗、批、改”运动的内容之中、“红卫兵运动”是否是“知青运动”的“前身”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辨析。

再如，党和国家对知青一代的肯定问题。本书梳理并记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知青问题上的一系列指示、讲话，以及中共党史二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对知青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评述，以及新一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知青“情结”等，这为深入思考这类问题提供必要的指引与参考。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 编写党史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根本原则

——中共四川省委原书记廖志高谈四川党史工作

文/陈文书

廖志高 1955—1967 年担任四川省委书记。1964 年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在“四清”工作参加培训时经常学习他的讲话，对他很是崇敬。大概是 1967 年，有一天造反派联合在锦江大礼堂召开大会批判“李廖死党”，我作为“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也被通知参加批判大会。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廖志高，他中等身材，虽然被造反派押在主席台站着接受批判，但仍然显得很坚定。

廖志高后来离开四川，调到福建省委当第一书记，以后又从福建省委调到中央组织部。我再见到廖志高书记时，已是 20 多年以后了。当时省委把我从四川广播电视大学调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这期间我和廖志高老书记有过几次直接接触，亲耳聆听他对四川党史工作的指示和要求。

一次是 1990 年 3 月 6 日，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党史研究室负责人会议。因廖志高曾当过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我们研究四川党的历史，不能没有他的材料，也需要听取他对我们征编四川党史的意见，接受他的指导。我们与他夫人郑英联系上，廖志高老书记同意我们马上去他们家。

这次见到的廖志高书记，和 20 多年前我见到的他，已是判若两人，显得很苍老，手脚也不大灵便了，不过思维清晰、敏捷，记忆力很好。他看见我们去看望他，十分高兴，说四、五月份要到成都去看看。他说，要编写好四川党史，首先要编写好四川党史大事记。他要我们在征集编写四川党史大事记上舍得下功夫，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这条根本原则，把史料搞准确。他特别强调，编写党史不能凭猜测，必须尊重历史事实，要实实在在地搞，胡编的东西无一点好处，而且极其有害！这次见的时光不长，但他对搞好四川党史研究、编写的几点意见，很中肯，对我这个党史工作新兵很有指导意义。

我们从北京回来后，就按照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会议要求和廖志高老书记的指示，在党史工委和党史研究室多年征编工作的基础上，加紧对四川党史资料做进一步征集、研究、整理和编写工作。经过大家一年多的艰苦工作，在原有基础

上，形成了一个百来万字的初稿。

二是 1991 年上半年，廖志高老书记来四川休息。5 月 16 日上午，我带领党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去向廖志高老书记汇报工作。在金牛坝招待所廖志高老书记的会客室，我向他汇报了我到省委党史研究室主持工作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以及四川党史大事记的征编情况。

廖志高老书记听了汇报很高兴，说四川党史研究工作很有成效，不但有可行的计划、措施，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比他想象的要好。他指出：四川省委的“一把手”，有几个都去世了，但还有一些健在。你们的征编工作一定要抓紧，争取在这些老同志还在的时候，把书编出来，送请他们看看，听听他们对书稿的意见。他说，我最关心合省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一定要把糊涂的历史搞清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合省到“文革”这一段我在职，以后的我未参加工作，情况不知道，没有办法讲意见。他反复强调，合省到 1966 年前的这一段历史争论最多，你们写出来了我要看，这部分我可以提一些实实在在的意见。

当我汇报已写了 100 万字左右的书稿时，他说：“太多了，无法看。有些事可以扯得很宽，但也可以压缩得很小。写得太多了，没有人看；写起来困难，看起来也困难。对一些史实要认识统一，不过对有些事情要达到认识上的统一，也很不容易，要你们来做这个统一认识的工作也困难，但你们一定要下功夫，把真实的历史资料收集起来，写出反映当时历史的本来面目的党史来。不要写得太庞杂，扯得太远太宽。”

三是 1992 年 5 月，廖志高老书记又来到四川成都金牛宾馆休息。6 月 1 日上午，我和党史研究室的几位同志去向他汇报四川党史工作。廖志高老书记对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感到满意，对我们以后的工作又谈了很好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对如何写好“文革”前那部分四川党史，提出了具体要求。这对我们进一步征集党史资料、编写好这部分四川党史，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 万民永忆女先锋

——纪念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诞辰110周年

文中共黑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今年10月25日是抗日女英雄赵一曼诞辰110周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追记这位抗日女英雄的光辉业绩和壮丽人生，对于我们缅怀过去，继往开来、开拓创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深远。

## (一)

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字淑宁，又名李一超，四川省宜宾县白杨嘴村人，她出生在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赵一曼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大地展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曙光，新思想、新风尚与旧道德、旧观念在进行激烈斗争的年代。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赵一曼在大姐夫、中共党员郑佑之的帮助下，结识了共产党员何珖辉、刘亚雄。他们经常把《向导》、《中国青年》、《妇女周报》等革命书刊寄给赵一曼看，坚定了她反抗封建制度、进行社会革命的意志。1924年，赵一曼经何珖辉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赵一曼入团后，由于积极参加团的活动和要求外出读书，引起封建家庭的不满。特别是操持家业的兄长像“阎王”似的以“三从四德”封建礼教严厉地管束她，使她失去自由。为了反抗封建礼教束缚和压迫，赵一曼写了一篇约3000字的《被兄嫂剥夺了求学权利的我》的文章，发表在1924年8月6日的《妇女周报》上，有力地向着封建家庭专制制度进行了挑战。文章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1925年秋，白杨嘴村成立了团支部，赵一曼担任支部书记。为了发动妇女参加革命，她与二姐(共青团员)组织起“妇女解放同盟会”，发展会员180余人。领导妇女学习文化，争取自由、平等，开展反对“三从四德”的斗争，使妇女解放热潮不断高涨。赵一曼所进行的革命活动被封建家族的叔、伯视为大逆不道。为了彻底摆脱封建家庭，1926年2月，赵一曼在二姐的协助下，毅然出走，来到远离家乡的宜宾县城。在宜宾县立女子中学，赵一曼一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一面在同学中进行革命宣传，带领同学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她的带动下，同学们纷纷剪掉了发辫，没人挽发髻。赵一曼在宜宾女中，聪明伶俐、活泼乐观、勇





1926年赵一曼求学于宜宾女子中学

敢泼辣，因而深受同学的敬佩。在女中学生会改选时，她被选为常委，并代表女中参加了宜宾学生联合会，为学联常委之一。

1926年春，中共宜宾特支成立，赵一曼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久，五卅惨案一周年纪念日来到了，赵一曼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带领同学冲出校门，走遍全城热闹的街市，开展反帝反封建讲演活动。同年端午节前夕，在宜宾发生一场抵制“仇油”（在反帝斗争中，日英等外国货被称为“仇货”，煤油被称为“仇油”）的爱国斗争。赵一曼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之一。由于赵一曼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学运风潮不断高涨，使学校当局十分恐惧。1926年7月中旬，学校以“嚣张”罪名，把赵一曼及另外几名学生代表开除出校。赵一曼等被开除的消息公布后，激起全校学生的愤慨，同学们组成“退学团”，以示反抗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的迫害。此时，北伐战争节节获胜，大革命的洪流奔涌向前。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县党部在宜宾公开成立，创办了中山中学。赵一曼和其他退学的同学一起进入中山中学学习。不久，党组织为了进一步培养赵一曼，决定送她投考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赵一曼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被编入女生队。从而，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学习、军事训练生活。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5月，夏斗寅在湖北发动叛乱。这时，赵一曼不顾自己患肺病住院，走出病房，奔赴战场，参加了攻打叛军、保卫武汉的战斗。7月，汪精卫叛变，至此，宁汉合流，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在这种形势下，组织安排她转移到上海，同年9月，又派她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赵一曼十分珍惜这一学习

机会。她积极克服文化程度低的困难，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努力学习俄语。1928年4月，她与同学陈达邦结婚。同年年末，组织决定让她回国，接受新的任务。那时，赵一曼正怀身孕，根据她的特殊情况，完全可以向组织提出暂不回国的请求。陈达邦也对她说：“等生了孩子后，我们一起回去。”但赵一曼不同意，她说：“要服从党的决定，孩子可以回国生，宁可自己困难，也要服从分配。”表现出她所具有的坚强党性。

赵一曼回国后，曾在湖北宜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以后又调到南昌，在中共江西省委机关工作。1929年11月，由于叛徒告密，省委机关遭到破坏。赵一曼侥幸脱险。这时，南昌一片白色恐怖。但赵一曼为了让组织及早营救被捕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背着孩子，沿途乞食，辗转来到上海，向中央及时报告了事情的经过。赵一曼为了不因照顾孩子而使工作受到影响，便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送到湖南陈家抚养。此后，她便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她曾参加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



赵一曼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

## (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东北人民反抗侵略者。同时，派出大批干部来东北组织、领导反日斗争。赵一曼就是其中之一。

1932年6月，赵一曼到东北后，先在沈阳进行党的地下工作。以后，又来到哈尔滨，任满洲省总工会筹备处组织部长，兼哈尔滨总工会党团书记。为了便于从事秘密工作，按组织决定她与省总工会书记老曹(黄维新)结为假夫妇。在哈尔滨，她受组织委派，曾给革命青年讲过政治理论，教育青年要把革命理论记在脑子里，落实在革命行动上。她曾在太阳岛与正在开会同志们一起处死一名前来侦探的伪警察。她常到老巴夺烟厂、三十六棚机车车辆厂、电车厂进行反日宣传，发展工会会员。1933年4月2日，她与老曹领导了著名的哈尔滨电车工人大罢工。在赵一曼的指导下，罢工委员会发表《告市民书》，在市区张贴大量传单、标语、宣传画，呼吁市民支持罢工工人的斗争。电车工人罢工进行两天，市区交通中断，城市陷于瘫痪，造成很大影响。在罢工工人的坚决斗争下，日伪当局不得不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复工条件，此次罢工取得了胜利。为指导抗日武装工作，赵一曼曾两次到海伦县巡视指导，并参加海伦游击队的斗争。赵一曼自从到东北，为了驱逐日寇，光复祖国大好河山，经常废寝忘食，不避艰险地努力工作。她曾以诗言志，表达自己矢志报国，为革命献身的思想感情。她在一首题为《滨江抒怀》的诗中写到：

誓志为国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

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934年4月，中共哈尔滨市地方党组织遭破坏，满洲省总工会书记老曹被捕牺牲，赵一曼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不久，她根据党组织的决定离开哈尔滨，转移到珠河县(今尚志市)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担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特派员。

开始时她在珠河铁道南一带从事妇女工作。为发动妇女，赵一曼深入到妇女当中。白天，她与妇女们一道干活，教唱革命歌曲；晚上，组织妇女开会，她给妇女们讲抗日救国和妇女解放的道理。在赵一曼的领导下，广大妇女被发动起来，参加了妇女会。珠河的妇女会活动十分活跃。她们帮助游击

队打水、做饭，为游击队员缝补洗涮衣服，做军服、军鞋、子弹带等。她们还担负着护理伤员、抗日宣传、传递信件等任务。

在反日斗争中，赵一曼特别重视群众抗日武装的建设。她 and 县委的同志们一道在珠河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十多支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在根据地里不仅建有不脱产的农民反日自卫队，还建有脱产的农民抗日武装“模范队”、“青年义勇军”。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地方，肃清根据地、游击区内的汉奸走狗，配合游击队作战，并为抗日部队输送兵员，补充主力。同年秋，一度参加抗日联合军的“黄炮”队叛变。他们窜到根据地后，即遭到侯林乡农民抗日武装的有力抵抗，受到沉重打击。1934年9月下旬，赵一曼领导地方农民武装到离根据地不远的五常县背荫河附近活动。日寇在这里设有一个秘密的用活人作实验的细菌工厂。当时正好有十几个浑身浮肿，面无血色的人从敌人的魔掌中逃了出来。当敌军正在追赶时，赵一曼率队冲了上去，向敌人打了一阵枪。之后，把这些受尽日寇摧残的十几个人背扶回后方医院。在后方医院里，赵一曼天天给他们端饭喂药，了解情况。待他们康复后，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日寇用活人作细菌试验，血腥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这件事对根据地群众教育很大，激起根据地群众对日寇的无比愤慨。在反日斗争中，赵一曼机智、勇敢，很是著名。当时，农民武装缺少枪支，地下工作人员在县城里得到一批枪支弹药，但城门把守严密，运送不出来。这时，赵一曼想出办法，她与一名女战士将枪支弹药用油纸包裹好，装在一辆马拉的大粪车里，由车老板向城门赶去。守卫城门的日伪军一看是拉粪的大车，嫌臭，连忙挥手让快走。就这样，一批武器从县城里运了出来。事后，大家都佩服赵一曼的机智、勇敢。

### (三)

1934年12月，大批日伪军对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冬季“讨伐”。由于叛徒吴某告密，敌人



1927年3月5日女生大队合影（标记处为赵一曼）

着重搜索我后方医院所在地四方顶子和苇塘沟一带。当时，赵一曼脖子上长个疮，住在后方医院，不幸被敌人捕去。在拘押期间，赵一曼有效地对伪军连长进行抗日宣传。她说：“你做事要想着你是中国人，在战场上我们兵戎相见，但你不能杀害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你杀我可以，但我绝不死在日本人手里。”伪军连长听罢其大义凛然的话语，深受感动，启发了他的民族觉悟，最后将赵一曼释放。

1935年2月，赵一曼被任命为珠河县铁道北地区区委书记。她继续在游击根据地从事党的地方工作，以支援、配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由哈东支队扩编而成)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珠河游击根据地的存在与发展给日伪统治以极大威胁。1935年7、8月间，敌人调动大批日伪军再次闯入珠河游击根据地，对抗日军民进行空前的“大讨伐”。在这种情况下，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召开会议，作出《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任务的决议》，决定由赵尚志率领第三军主力离开珠河，去松花江下游汤原等地开辟新游击区，同时留下部分队伍在珠河游击根据地坚持斗争。据此，第三军二团大部随主力去汤原，其余部吸收珠河五区模范队、青年义勇军编成新二团留守游击根据地。由王惠同任团长，赵一曼任政治部主任。

在反“讨伐”斗争中，赵一曼、王惠同率领新二团在珠河游击根据地与敌军进行数次血战。当时，天气渐冷，战士衣着单薄，他们经常风餐露宿与敌人作战，有力地策应了赵尚志所率第三军主力部队的活动。对于赵一曼的抗日活动，日伪报纸曾以“红装白马女匪首，狂奔于密林中”做过报道。1935年11月15日，新二团在铁道北春秋岭活动时，被日伪军包围。在突围激战中，我军虽击毙日军横山部队机关枪队队长古谷清一等数人，但也受到很大损失。团长王惠同负伤被俘，后被杀害。赵一曼左手腕被敌人子弹打穿。许多战士牺牲，队伍被敌人打散。之后，赵一曼与另外四人转移至西北沟，在一所空房子里养伤，准备再找失散的队伍。11月22日，由于汉奸告密，珠河伪警察队首席指导官远间重太郎和伪警察中队长张福兴率第三中队包围了赵一曼所住的房子。战斗中，两名同志牺牲，赵一曼左腿负重伤。在子弹打光、后退无路的情况下，赵一曼等三人被俘。

赵一曼等被押回县公署大院，正在珠河的伪滨江省警务厅特务科股长大野泰治见她流血过多，怕她死掉，取不到口供，便马上对她进行审讯。审讯中，大野残暴地用鞭子抽打她，用鞭杆戳她的伤口，逼她承认共产党员身份，讲赵尚志部队的情况。此时，赵一曼只是愤怒地瞪着大野，对组织的





赵一曼牺牲地—珠河县小北门

机密守口如瓶。但当大野问她“为什么进行抗日活动?”时,赵一曼却一下打开嗓门,作出义正辞严的回答:“我是中国人,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还用得着解释吗?”接着,她对“日满亲善”、“王道乐土”等欺骗宣传和日本侵略者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严厉的控诉。敌人从她的坚强态度上认为,她是“一个以珠河为中心,把三万多农民坚固地组织起来的中心指导者”。

第五天,赵一曼由大野泰治亲自监视,从珠河乘火车,被押解到哈尔滨,关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看守所里。以后,大野对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几乎每天用各种酷刑进行一小时的审讯。但不管敌人是引诱软化,还是以死威胁,都不能动摇她坚强的革命意志。她回答敌人说:“我的主义就是抗日,正如你们的职责是以破坏抗日会逮捕我们为目的一样,我有我的目的,进行反满抗日运动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十余天后,赵一曼腿部伤口已溃烂,病情危重。此时大野等敌寇仍不死心,决定给她治疗,幻想医愈后“好当作破坏抗日组织的‘反间’用”。12月13日,赵一曼被送进哈尔滨市市立医院(现哈医大附属第一医院住院部旧楼)。入院后,经X光照相发现,其左大腿呈粉碎性骨折,在软组织中,竟有二

十余块碎骨片。敌人为了保住她的生命,决定给她做截肢手术。但是,遭到赵一曼的断然反对。以后,在市立医院外科大夫张柏岩的精心治疗下,赵一曼的伤势逐渐好转。大约经三四个月,她已经能够拄着拐杖散步了。1936年3月,赵一曼从第一病房迁到第六病房(现医大邻一曼街小二楼处)。并派警士董宪勋和护士韩勇义监视、看护她。

董宪勋和韩勇义都是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青年。赵一曼常常向他们讲述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与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可歌可泣的活动情形,及在宾县、珠河、延寿等地深山里,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富有革命意义。她把日本侵略者的种种暴虐罪行和驱逐日寇、推翻满洲国是每个中国人的神圣使命写在包药的纸上,让他们看。经过赵一曼的教育,董宪勋和韩勇义都表示要作一个反满抗日的志士,要帮助赵一曼脱逃,一起奔赴哈东抗日根据地。6月上旬,从伪警务厅传来了将有一批伪警察调动工作的消息。为了争取主动,6月24日,赵一曼召集董、韩二人开会,决定6月28日逃走。

#### (四)

6月28日,是个星期天。董宪勋与韩勇义乘医

院公休，守卫松懈之机，于当晚9时，将赵一曼从第六病房后门抬入汽车。之后，沿山街向太平桥方向开去。到文庙附近屠宰场后面，赵一曼下车，乘上事先预备好的小轿，由轿夫抬着逃出哈尔滨。当夜，赵一曼和董宪勋、韩勇义三人又在金家窝棚换乘一辆马车，向宾县三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奔去。

6月29日晨，敌人发现赵一曼逃走，于是对28日出入第六病房的人员及车辆进行了严格的调查，结果发现了协助赵一曼28日逃脱的那名俄国人司机。根据他的口供，敌人又找到了道外轿铺，随即派出伪警察快速向宾县三区方向追赶。6月30日晨，在距游击根据地仅二十里的李家屯附近，赵一曼等三人被敌人追捕。

赵一曼被捕后，敌人把她关进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拘留所(现东北烈士纪念馆地下室)。残暴的伪警察厅特高股长林宽重指令凶手用汽油灌、皮鞭抽、烙铁烫、铁条扎等种种酷刑加倍折磨赵一曼。但赵一曼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她怒斥特务头子林宽重道：“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人的信仰。”与赵一曼同时被捕的董宪勋、韩勇义在其影响下，也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

一个月后，敌人对赵一曼再也无计可施了，于是决定将其处死。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敌人押解到她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珠河县。在前往珠河的火车上，赵一曼镇定自若。敌伪档案资料记载：“在押送途中，她虽然感到死亡逼近，但她丝毫没有表现出惊慌的态度，反而透露了为抗日斗争而死才是光荣的口吻。”在列车中，赵一曼从押送的敌人手中要来纸笔，给心爱的儿子写下了感情炽热的遗言书：“宁儿！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际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一九三六年八月二日你的母亲

赵一曼于车中”

赵一曼写完之后，觉得余言未尽，又提笔写下了：“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到了珠河，敌人把赵一曼架在一辆车上“游街示众”。但她气势昂扬，视死如归。当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赵一曼在珠河小北门外英勇就义。临刑前，她举起铐着手铐的双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对此，敌人资料记载说：“其态度从容，毫无惧色，令人震惊。”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这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献身的优秀儿女。东北光复后，为了永远纪念她，当地政府将她从医院逃离哈尔滨时所经过的山街，改名为一曼街。同时，将她遭受酷刑的原哈尔滨市伪警察厅改建为东北烈士纪念馆。为赞颂、褒扬这位巾帼英雄，朱德委员长曾题词：“革命英雄赵一曼烈士永垂不朽！”郭沫若为其题诗：

蜀中巾帼富英雄，石柱犹存良玉踪。

四海今歌赵一曼，万民永忆女先锋。

青春换得江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

东北西南齐仰首，珠河亿载漾东风。

党的好女儿、忠贞的抗日民族英雄赵一曼虽已逝去，但她胸怀壮志、意志坚强、不屈不挠的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品格及从她身上放射出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将永远是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面鲜红的旗帜。



赵一曼烈士牺牲地“巾帼英雄”石碑

## “莫忘四川”七十年后今又说

文/王皓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中国在长达14年的抗战中牺牲、死难的军民高达3500万人，所以中日之间是生死战。由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民族的全民族的抗战，其酝酿、演进、形成有一个过程。无论从战略抉择还是历史事实，这场对决的最后底线在四川。

“莫忘四川”，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又一次被唤起。

### 一、“打国仗”：出川壮士尸山血海卫国土

川军将士谓出川抗日为“打国仗”。“打国仗”通俗精确地说明了抗战的性质，不是封建时代为皇帝打仗，也不是军阀割据为长官打仗，而是为国家民族而战。

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四川军阀不服膺中央政权，实行所谓“防区制”，连年内战。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秉持民族大义，毅然决然担负起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积极主张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在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推动下，1937年8月7日，川军首领刘湘在南京最高国防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抗战才能救亡，才能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sup>①</sup>并且表示“四川可以出兵30万人，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sup>②</sup>在他的号召和联络下，川军将领邓锡侯、杨森、刘文辉、李家钰等纷纷请缨抗战，为促成全国地方实力派全面参战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川军出川打的第一场“国仗”是淞沪会战。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国国民党政府主动迎战的第一场重要战役，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为惨烈的战役。其战略意图在于减轻华北方面抗战

压力，寄望西方干涉，争取全局主动。但随着国际社会调解无效，日军不断增兵，实力悬殊，中国军队局势逐渐恶化。待川军远征数千公里抵达战场，悲壮的结局已经注定。

开赴上海参战的川军是被称为“草鞋兵”的第20军。尽管装备极其落后，但在“抗日救国”感召下，川军作战异常英勇。据第124师第805团团部少尉见习官胡忆初回忆：“说来真是骇人听闻，深约2米的战壕，在战争开始时，人们还要站在踏脚坑上才看得出去，随后战壕逐渐被战士的血肉填满了，此时死尸堆积竟比战壕还高，活着的人是用先烈的血肉作掩体，继续打击敌人的……全团数千人参战最后只剩下150名官兵，其中很多还是轻伤未离队的。”<sup>③</sup>川军其他各部同样打得惨烈。第26师官兵付出了惨重代价：“全师4个团长，两个阵亡。14个营长，伤亡13个，连、排长共伤亡250余名。每个连留存下来的士兵仅三五人，最多不过八九人……全师4000多人，这场仗打后仅剩下600多人！”<sup>④</sup>是役大战下来，第20军伤亡近50%，战绩居参战70多个师中最优的五个师之一的第26师伤亡超70%。

投入淞沪会战75万左右的中国军队以血肉之躯坚守上海3个月，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者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战略部署。淞沪会战以惨烈失败告终，而正是包括川军在内的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为国民政府退守四川，凭借天险，倚苏美援助，奠定了持久抗战的时空格局。

滕县之战，王铭章将军率部死守3昼夜，川军第122师阵亡过半，巴蜀健儿的碧血浸染鲁南大地。李宗仁在回忆录中感慨地说：“若无（川军）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大捷！”广德战役，饶国华将军携川军第145师与县城共存亡，遗下一万名



将士的英魂……太原、武汉、长沙及历次会战，川军均有参战，打了无数恶仗，血染寸寸河山，回故土者寥寥。滇西缅北之役，更有四川男儿的大量头颅抛留在国境之外。

8年抗战，川籍将士263991人马革裹尸，356267人负伤，26025人失踪，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首。<sup>⑤</sup>其中，饶国华、王铭章、李家钰、许国章、王润波、李成烈等将领忠勇殉国。

川军将士尸山血海铺就了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的基石。由此观之，川军“打国仗”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必然行动，反过来，民族危机成就了川军之为一军的军人血性和军队本质。这也昭示一个真理：个人、团体、局部的利益只有符合国家民族利益的要求，才会体现他的价值意义。

## 二、支前线：后方民众粮棉钱物保供给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正逢广东陈济棠反蒋驱陈（铭枢）、汪精卫另立国民政府、蒋介石四面围剿红军。此前一年才结束的上百万兵力参与厮杀的中原大战，虽然以蒋介石获胜告终，但各自统兵数十万的西北冯玉祥、山西阎锡山、广西李宗仁三大派系，都在积极进行反蒋。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使我屈服”，“此时倭寇无与我开战之利”。蒋介石认为日本虽然野心勃勃，但他们还没有敢于全面与中国开战的力量。

由此不难看出，国家表面统一，实则内忧外患，不但没有进行充分的国防建设战防侮，甚至国家领袖心理准备都不到位。平津、南口战役一路下来，华北的大片河山迅速被日寇的铁蹄践踏。时局可以概括为：军队仓促应战，一触即溃；国家撤退搬迁，实则逃难；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不得已，民国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退守西南，沉重的负担加在四川一省。

面对大半个中国被占领、沿海港口被封锁、铁路干线被切断、滇越铁路被隔阻，全国不能进行有效的动员和资源组织，四川人硬是凭着瘦削的肩膀

撑起国家倾斜的天空。

一是战争动员，激发民愿。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的次日，四川省主席刘湘立即电呈蒋介石并通电全国：“除全民抗战外，别无自存之道，要求当局早决大计，甫澄愿率川军供驱遣抗敌！”8月7日，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力主抗战，25日返川后即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军民：“凡我国人，必须历尽艰辛，从尸山血海中以求得最后之胜利！……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9月5日，四川省各界民众齐聚成都少城公园欢送出川抗日将士，刘湘、邓锡侯等将领莅临动员，几岁小学生流着泪水上场致词，四川大学师生赠送16面“抗敌先锋”锦旗，妇女儿童手捧赠品敬献将士……纵队司令唐式遵激昂宣誓：“失地不复，誓不回川！”青年王建堂请命杀敌随部队开拔前，安县政府收到其父寄来的一面出征旗——居中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一个“死”字，足见四川民众对“打国仗”的精要诠释。

二是征兵参战，全国之冠。抗战开始后，出征的川军经过整编，扩建为6各集团军，兵力在12个军40万人以上。此后四川每年向前线输送青壮军人，蜀中子弟由以前被迫从军变为自愿参军上前线，出现了母送子、妻送夫、兄弟姊妹相送上战场的动人场面。抗战8年，四川（含西康）提供了300万人的兵源充实前线，占全国同期实征1405万余人的1/5还强，人数居全国之首。四川平均约14人中即有1人当兵，全国抗日军人每5人中即有1名四川兵，抗日各战区、各战场几乎都有川军参战，以致当时前线有“无川不成军”之说。<sup>⑥</sup>

三是出钱出粮，倾其所能。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四川成为主要补给基地。军粮方面，四川农民承担了全国总数的1/3左右。如1941年全国军粮为米9629836大包、麦7619679大包，而四川军米一项就交了2250000大包。1942年全国军粮为米11039656大包、麦7019843大包，而四川军粮则交了7485000市石（折合约5613750大包）。以后几年川省承交军粮比重还有增加。<sup>⑦</sup>四川农民为前方将士还提供了大量油、盐、糖、肉等副食和军棉、衣物、

桐油、药材等后勤物资。同时，四川承担了全国1/3以上的财政开支，而此期间四川连年旱灾，遗祸多年的所谓“救国公债”更是让川民不堪重负。

四是捐物献金，踊跃积极。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群众团体在抗战爆发后发起举行寒衣劝募和春节劳军等活动开始，全川城乡积极响应开展各种形式的捐物献金活动。到1939年9月中旬，重庆各界群众捐款已达500万元，继后进入经常性的捐献。1944年春，冯玉祥将军到川中各地劝导节约献金。每到一地，万千民众争先恐后捐款献物。在内江，金台旅馆经理李焕章表示，从今以后每年捐献黄谷600担，直到抗战胜利为止。在自贡，盐商余述怀一马当先，捐了1000万元。在成都，一群乞丐走上献金主席台，双手擎着多年讨来的2250元钱交给冯将军。半年之内，四川共捐法币6260万余元。<sup>⑧</sup>据当时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完全统计，抗战中四川各地献金总额为5亿多元。

五是加紧生产，支援前线。武汉大撤退后，大批工业企业内迁。据统计，抢运入川的企业共计600余家，相继建起了钢铁、兵工、机械、纺织、造纸、化工、制糖等工厂。在日军的大轰炸下，为保持工厂不停工，工人废寝忘食，日夜苦战，民工修复炸毁的机场、道桥、房屋、设施，无以数计。

此外，四川以广博的胸怀，接纳了很多学校等文教单位，救亡的同时保存了大部分中华文脉的精华，莘莘学子在逆境中发奋学习，造就了无数新中国栋梁之才。2000余万沦陷区人民在巴蜀大地栖息繁衍，其中1/3成为永久住民。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发表社论说：“仅从这些简略的统计，就可以知道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送出了多少血肉，多少血汗，多少血泪。”“在8年抗战之中，这个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就是四川。自武汉失守之后，四川成了正面战场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的中心……我们想到四川人民，真不能不由衷地表示感谢。”<sup>⑨</sup>

四川的物产和老百姓的生产奠定了中国抗战的物质基础，成为挽救中国命运、支撑中华各民族抗战到底的底线！

### 三、保畅通：乡亲父老公路机场筑干线

四川多山而“蜀道难”，抗战前没有一条与外省相通的公路。抗战爆发后，四川作为战略大后方和陪都重庆所在地，开辟巴蜀交通，无疑成为头等大事。四川老百姓用一双双长满老茧的双手和简单原始的工具，以感天动地的坚毅，凿通一条条线路，筑起一座座机场，保障闭塞的盆地与外界的畅通。

抗战前一、二年政府当局已动员民工修筑川陕、川黔、川湘、川滇公路，虽大部分已经完成，但并未全线修通。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决定赶筑这4条干线公路，所需劳工，在川境部分均征用沿线川人。当时筑路无近代机具、技术落后，开山辟岭、挖土运石，全凭契子、锄头和扁担进行手工作业，施工万分艰难。川陕公路沿线17万民工为赶工期，多以马灯照明，挑灯夜战。由此可见四川人民急国家之急，拼命奋战精神之一斑。到1940年，川陕、川湘、川黔、川滇公路先后完工通车，对支援抗战起了重大作用。

为便于陇海铁路线运输物资直抵重庆，当局开辟了重庆溯嘉陵江经南充至广元航运、或经达县到汉中的汉渝公路，构成川陕东线。1938年底，沿线10县41600名民工采取边测量边施工和分段修筑等办法，开工筑路。1943年春，汉渝公路万源至重庆段全部竣工通车，计有417公里。其中1941年建成的达县通川大桥，为当时四川省第一座大型钢筋混凝土单车道悬臂桥梁。汉渝公路大大缩短了重庆至陕西的里程和时间，比由重庆经璧（山）绵（阳）的川陕中路至褒城缩短90公里，比由重庆经成渝公路转川陕西路至褒城缩短270公里。抗战期间，新修通车的公路上，军车奔驰，客车和货车穿梭，民工推着“鸡公车”往返于小道，在运输军用物资、民用物资和广大乘客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初期和中期，中国的外援主要是通过西北国际大通道获得苏联援助。苏联不但在政治、道义、精神和外交上给中国抗战以支持，还给予贷款和军事物资援助、派遣军事顾问和各类专业技术人

员来华、派遣空军志愿人员与中国空军并肩作战。至苏德战争爆发的近4年时间里，中国迫切需要和实际获得的外援物资，绝大部分来自苏联，每天都有成百上千辆汽车，以及绵延数十公里的驼队颠簸在这条国际线上。

抗战中后期，中国的外援主要是通过西南国际大通道获得美国援助。抗战开始后，日军相继封锁中国沿海港口、切断铁路干线、阻断滇越铁路。尤其在德国进攻苏联后，西北国际交通线中断。中国抗战赖以生存的外援线仅剩下一条滇缅公路，连着重庆—成都，通向印缅、东南亚。1942年1月初，日军从泰国进攻缅甸，一直打到怒江西岸。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中国守军被迫及时炸断惠通桥，以阻滞日军于怒江西岸，由此滇缅公路中断。

在西北与西南通道都完全中断的情形下，中国的实际外援已被掐断。为了保有西南国际通道，美英中花了很大代价开辟了中印“驼峰航线”，但空运物资有限，运行成本也很高，油耗难以为继。时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遂谋划紧急修筑中印公路，从印度雷多穿越缅北野人谷，进入中国与滇缅公路衔接。1945年1月28日，中印公路正式通车，宣告被日军封锁2年8个月之久的西南国际交通线终于打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空军来到四川配合中国空军对日作战，四川新建扩建空军基地33处。在新津、邛崃各扩修1个轰炸机场，在彭山、广汉各新建1个轰炸机场，5个驱逐机场则在成都、温江、德阳等县新建和扩修。轰炸机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美国飞机B29型空中堡垒的基地。飞机从成都飞日本本土单程4小时，来回需8小时，还有4小时以备应付敌机拦截后仍可返回基地。

修建机场的艰巨工程，开始于1943年12月，完成于1944年5月，共动员150万四川民工参加。为了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在没有机械化施工的条件下，民工们仅凭双手和简单工具，不顾流血出汗，艰苦奋斗，仅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任务。

机场的修建和投入运行，中国军队不但夺回了制空权，还具备了直接轰炸日本本土的能力，有力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

#### 四、结同盟：东西战场反法抗战迎和平

抗战中的两条国际通道，正好重合了中国古代通往西域的西北丝绸之路和由西南通往印度的南方丝绸之路。两条国际通道重合两条丝绸之路，而在四川相交，使两大古代文明力量开始现代汇聚，演绎了正义与邪恶、文明与兽行的较量，影响着国内国际时空、物质、能量的流动、积蓄、转化、重组和演变。陪都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名城。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第一次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表明中国人民在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中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和承受的巨大牺牲，赢得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关注、同情与尊重，标志着中国与英美结成同盟、建立军事机构、共同对付法西斯迈出了实质性步骤。1942年1月1日，由美英中苏4国领衔，其余22个国家依次签署的《联合国宣言》（即《二十六国宣言》）发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由此正式建立。5日，蒋介石正式在重庆宣布就任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一职，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正式成立。

自此，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和战时中国对外交流的窗口。东南亚战区司令蒙巴顿两次访渝，与蒋介石晤面，密切了远东反法西斯战场两大战区的合作。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各国的各类代表团以及众多的知名人士，频繁往来于重庆与世界各地。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是何背景，他们都实实在在地帮助了中国政府和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对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合力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首先，促进了两条抗日统一战线的国际结合。“卢沟桥事变”后，互有血仇的川军、红军、国军一年多前还兵戎相向，如今共赴国难。因而四川作为抗战中枢有着广泛的民意支持，构成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流主体主要阵地。以滇缅公路、中印公路为纽带，中国抗日战场和世界反法西斯东方战场结合接轨。国际上，在中国全面抗战初期，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苏德战争爆发，一度“不干涉中日战争”的苏联卷入反法



西斯战场。随着战争进程的推进，中国正面战场抵抗愈来愈顽强，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不断收复失地，英美逐步对中国抗战表示同情和支持。当珍珠港事件爆发，英美立场彻底改变，遂与中国结成联盟。加拿大的白求恩、印度的柯棣华以及美国史沫特莱等人，自愿来中国参加抗战，连日共领导人冈野进也亲自来中国组织反战宣传。由此，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得以最终实现，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也就汇合在一起。

其次，密切了两个抗日战场的相互配合。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的一场生死决战。中国一方战争力量弱的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战在正面战场实行“持久战”与“消耗战”，即所谓“以空间换时间”应对日军的“速战速决”。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新四军在苏皖浙地区，一方面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一方面在敌后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互相配合，缺一不可。正面战场的持久消耗战，仰仗充足的物资装备补给，中国缺少制造能力，外援必不可少。所以交通线，就是生命线。西北国际大通道包含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人、苏联援华人员，甚至盛世才、“马家军”等“五位一体”的通力合作，加之宋庆龄先后铺垫策应，才使得大量抗战急需物资得以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将士手中。滇缅、中印国际大通道的打通和维护，更与印缅人民和爱国华侨的热情支持以及盟国的物资援助分不开。

再次，推动了中国以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身份与英美大国缔结同盟。国际援助固然极端重要，但

中国更主要的还是立足于自己的力量，哪怕采取水淹（花园口炸堤）、火烧（长沙焚城）的原始作战，锄头挖、鑿子凿、石碾压的原始筑路，也要坚持，而且苦撑了8年。因而，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中最惨烈、最艰苦，也是最光辉、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苏美英几大巨头也越来越认识到，是中国延缓了德意日法西斯相互勾结扩大侵略战争的进程，世界反法西斯离不开中国。罗斯福曾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你想想有多少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sup>⑩</sup>于是，美英首先与中国结成同盟。这样，中国抗日战场也就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世界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大联合，形成对法西斯轴心国的合围，和平的曙光终于浮现。

四川是国家之一部，支持抗战是四川的义务，自然不应居功。《新民报》社论发表于民国政府还都次日，仅距抗战胜利半年多，就有了“国府还都，一片庆贺之声，但是很少有人提到抗战期中的四川……一离四川，就帘高堂远，弃之如遗”的现象。时隔3年，国民党败逃台湾，蒋介石最后作别四川的残影消失在成都凤凰山机场。此前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可见，他并非视四川民生与社会无睹，但却没有带来福祉的实质行动。历史无法假设。

莫忘四川，就是不但七个月、七十年，而是世代代，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作者单位：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

#### 参考文献

- ① 乔诚、杨续云：《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版，第228页。
- ② 乔诚、杨续云：《刘湘》，华夏出版社1987版，第228页。
- ③ 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文史精华》2009年08期。
- ④ 高华：《王铭章殉国与川军抗战》，《文史精华》2009年08期。
- ⑤ 马宣伟、温贤美：《川军出川抗战纪事》第274-275页，四川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⑥ 王晓春：《简述川军出川抗战》，《四川抗战档案研究》

第86页，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⑦ 甘典夔：《1941年四川田赋改征实物经过》，《四川省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内部资料）第120-121、148-14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64年。

⑧ 孙挺信：《中日大决战》第四章“艰难岁月”，百家出版社，1991年。

⑨ 《新华日报》1945年10月8日。

⑩ 《群众周刊》第二卷，第10期。

## 纪念碑

——写给抗日战士

◎唐维扬

纪念碑站起来  
战争已变成永恒的记忆

钢枪铸入硝烟 成为精彩插图  
鲜血流向琴键 谱成雄壮乐曲  
弹孔是鸟巢 飞出东方黎明

这些蘸着枪声写家信的汉子  
这些鼾声裹着火药味的汉子  
悄悄地走进地层  
成为根须  
聆听花开鸟鸣以及  
人们品尝果实的声音

妻子站成村口的路标  
最终把汉子  
盼成一块年年岁岁  
开满白花的石头  
砌成共和国最初的根基

一年一度 孩子们来到这片  
最肥沃的土壤上 汲取绿色营养  
然后一茬接一茬地茁壮

碑，直指苍穹  
写成永久的惊叹

（作者单位：《泸州日报》社）

## 白山黑水上空的一场大雪

——致赵一曼烈士

◎张合

她是  
白山黑水上空的  
一场大雪  
集合起百万亩大森林的呼啸  
想一举  
冻结这场战争  
让春天开满原野

可惜战火太宽太滚烫  
她只有举起雪飞蛾的翅膀  
一扑  
再扑  
直到

把自己扑倒在东三省的血泊里  
  
监狱怎么关得住一朵雪的梦想呢  
子弹怎么挡得住一朵雪的脚步呢  
  
当一声罪恶的枪响  
让生命雪崩  
她并没有死  
她  
上天成为东北角洁白的云彩  
入地成为松花江温软的浪花  
  
胜利已经很久了

我不想再翻阅历史的冰山  
细数她的伤痕  
统计她的疼痛  
因为每一朵司马迁一样的白雪  
把她的晶莹和圣洁  
记载到了今天  
以及未来

如果你的梦里  
有一朵雪花翩翩天上来  
那就是她  
请打开大门  
张开双手迎接她回家

（作者单位：泸州市人民检察院）



## 周总理和一位旺苍籍老红军的故事

文/蔡勇 张法祥



红四方面军出川已经80年了。80年前有一位旺苍籍老红军，出川后一直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小灶工作。长期在周总理等中共中央领导身边服务，曾陪同周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他就是旺苍籍老红军王诗书，木门镇杏垭村人。1933年在南江县长赤参加红军。由于主人公特殊的身份、岗位、环境和家庭生活而鲜为人知。探索真相，始终是那么遥远，或许永远是一个秘密……

——题记

王诗书，男，1912年3月出生，四川省旺苍县木门镇人。1933年在南江县长赤参加红军。1934年—1935年在川陕省委运输队、省委伙房工作。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前，徐向前根据红四方面军在征途中炊具容易丢，伙夫不够用，部队经常开不上饭，直接影响行军和作战情况，提议抽调一批炊事员，带上粮食、盐巴等物资随李先念同行，会师后归属中央红军部队。<sup>①</sup>王诗书开始从红四方面军到中央红军，1939年入党，1939—1949年调中央小灶工作。<sup>②</sup>期间，王诗书一直由邓颖超大姐直接领导。<sup>③</sup>后来就一直在周总理、邓大姐身边工作。<sup>④</sup>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与邓颖超于当年11月7日从中南海的松寿斋搬到了中南海西北角的西花厅，负责打前站的就是从“中央小灶”为周恩来选调的第一个炊事员王诗书。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就这样和一位旺苍籍老红军发生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 周总理亲自安排探亲

1950年1月周总理要出访苏联，临行前，总理特别向邓颖超提出：这次出访，随行人员要尽量减少，包括司机、炊事员等卫士组的同志都不带了，在我出访期间可安排他们分期探亲。他还特别提到炊事员王诗书探亲的事，说：可先听听老王的意见，如他不急，就另作安排。

原来，周总理知道王诗书是四川旺苍县籍的老红军，他投身革命，离家一走就是十几年，家中全无他的音信。全国解放后，才得知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生活困苦，又不知他的死活，万分无奈之下，又找了丈夫，以抚育和照顾孩子和两位老人。

周恩来知道王诗书遇到了这样的家庭问题，需要很妥善的解决；又考虑到当时的四川旺苍县交通不便，社会秩序混乱，他一个人回去，安全也很难得到保障，会遇到很多麻烦。他不放心王诗书，就提出：找个机会，让他与人结伴回家，这样会安全些。



1951年，党中央政务院心系老区人民，组织了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大规模访问团，由周恩来亲自主持组团。团长是内务部长谢觉哉，共分中央及湘、鄂、赣、川、陕等8个分团。代表团的成员是由中共中央机关和政务院各部门选派的。川陕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团长就是王维舟，副团长余洪远、胡耀邦。

总理办公室够代表资格的人很多，相同条件的就有3个，但是能入选的名额只有1个，这个名额周总理决定给王诗书。为了让王诗书安心回家，周总理还特地让伙食管理员赵顺同志给他买了一个紫红色大皮箱。

王诗书知道情况后，心情也由惊喜变得沉重了：那时，人民政府刚刚成立，还没有实行工资制，总理每月也就十块钱津贴费，他们夫妻俩要节省多久，才能把买皮箱的钱省出来啊！再说，总理他自己除了有一双皮鞋穿在脚上，一条皮裤带系在腰上，从客厅到卧室，再到办公室就再也找不到一件皮制的东西了。于是，他对正在厨房洗碗的霍英华（邓大姐服务员）说：“小霍，我想好了，皮箱让老赵退回去。这么贵重的东西，我怎么能要？总理为我回家的事，费了那么多心思。”他哽咽着，说不下去了。小霍说：“你让老赵退，他怎么能退，你还是收下才好！”可王诗书还是执意要退了。小霍就把他要退皮箱的事告诉了邓大姐。邓大姐说：“你去告诉老王，皮箱买了就不能退，是总理和我的心意啊，箱子装东西作纪念，不能退。退了，总理会不高兴的。”邓大姐怕王诗书把箱子当成精神负担，就亲自找王诗书做了工作，并叫小霍用旧布帮他做了个护套，就这样王诗书才收下了皮箱。同时邓颖超还亲自为王诗书回家准备了一些食品，让他带回去。

### 隐身的“红娘”

1951年10月的一天。周恩来与邓颖超难得一起共进午餐。周恩来坐下第一句话就对邓颖超说：“老王回家探亲的情况，代表团给我写了报告，他

们和旺苍县政府的同志帮助他处理得很好。顺利解除了与原妻子的婚姻关系，处理这件事，老王的态度是很难得的。他回来后，情况怎么样？”“叫英华和你说说，他们天天接触，知道得比我多。”邓颖超回答说。小霍于是对周恩来说：“总理，老王回来后，不留意看不出有什么，就是更不爱说话了。从不提家事，总是不停手地搞厨房卫生，埋头干活。”“还有什么？”周恩来又问了一句。小霍想了一下说：“老王回来后，有时说话下嘴唇发抖，可能是有心事。”周恩来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老王为革命失去了一个家，咱们要帮他再安一个家，为他找个伴好吗？”小霍马上说：“要不要把何秘书（周恩来的行政兼警卫秘书何谦）和成元功同志（周恩来卫士长）找来？”周恩来说：“不用了。你顺便和他们说说就行了。”看到餐桌上的饭要凉了，小霍赶紧要走。“小霍，你回来。”他接着说：“你留意物色，要积极稳妥，不要声张，明白吗？”小霍用心地点着头，表示明白了。

当天，小霍把总理要为王诗书安家找伴的事对何谦和成元功详细地说了。他们两人对此心领神会。何谦愧疚地说：“这样的事，又让总理做在前头了。”并对说：“小霍，总理很关心老王的家事，你是女同志，为老王物色伴的事，你要多费心。”成元功说：“英华，给老王物色伴的事是有难度的，咱们在西花厅与外界接触少，周围又没有合适的人，你可走出西花厅，到外边去，办这事，来不及可不请假，事后说一下就行。”他们三人合计好，要齐心协力积极稳妥地去做，让周总理早日了却这桩心事。

第二天早上，邓颖超又找到小霍，说：“给老王物色伴的事，你别急得睡不着，可抽空去找老王谈谈，看他有什么想法，也了解一下他家中的实际情况，要实事求是地做介绍。”

听了邓大姐的这番嘱咐，小霍似乎知道这事该如何做了。她于是抽空来到王诗书宿舍，说：“总理向大姐夸你，说你家事处理得很好，顺利解除了婚约，你的态度是很难得的。”王诗书赶紧说：“我一个人怎么能处理得好？是代表团和旺苍

县政府的同志们帮助办的。我的儿女长大了，我很对不起他们，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可他们见了我还是那么亲，他们叫我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现在我也记不清我是怎么答应的。”小霍看他太伤感了，便对他说：“你的家事已经处理好，你和我说说。你还想找个什么样的伴？”王诗书红着脸对我说：“你看我哪有心思去谈这种事啊。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以后再说吧。”

小霍冷静下来一想，怎么能完成周恩来交给的为他找伴的任务呢？于是，急中生智的说：“这样吧，我替你说出条件，你要同意就点头，行吗？”接着，就对他说：“我要替你物色一个年龄相当的，人品长相相配的，绝对不找小脚的。”王诗书一听笑出了声，认真地对我说：“小霍，我能有什么条件啊。只想这事千万千万别再让总理、大姐为我操心就行了，你就看着办吧。”经过努力，小霍终于为王诗书物色到了吴康宁同志家的阿姨郭姐。据吴康宁介绍，郭姐对老伴人选的健康很在意。小霍马上介绍：“老王同志身体很健康。总理卫士急

病住院，做手术要输血，他主动赶到人民医院献了200CC血，回到西花厅就去厨房干活了，还是大姐劝他休息，并叫管理员买了两只老母鸡，煮鸡汤给他喝。他现在身体一点儿事也没有。”第一次谈这事后，小霍和吴康宁约定，他们俩做介绍人。安排他们在中南海紫光阁的海边见见面。

王诗书和郭姐经过一段接触了解后，向组织上提出要登记结婚了。大家都高兴，终于完成了周总理交给的任务。周总理的这桩心事也算了却了。<sup>⑤</sup>

## 深情话离别

一天，何谦找王诗书谈话，对王说：“总理考虑到你多年的厨房工作，接触外界少，有个锻炼提高的问题，要安排你去总务处，到管理科或膳食科搞管理工作。你这样的老同志，家也安了，总不能让你和过去一样日夜吃住在单位，总理于心不忍呀。”王诗书认真地听后说：“我还想为总理做可口的饭菜，我不想离开这里。”何谦又作了解释工



五十年代初期，周恩来和身边工作人员在西花厅合影。



周总理、邓大姐送给王诗书的照片（霍英华翻拍）

作。但王诗书却怎么也想不通。

平日里，不是周总理、邓颖超让卫士或者服务员叫他，王诗书从不到总理办公的前院，怕见到周恩来打招呼，耽误周恩来的时间。这次他很清楚。对于调他去总务处工作的事一旦组织定下来，就不能不去了。所以他破例地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

王诗书一见周恩来的面就说：“总理，你不要我了。”说着就像孩子似的哭起来，看到王诗书这样的动情，周恩来立刻打电话请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琦到办公室来，对李主任交代说：“你通知人事部，老王的工作不要变动了。也告诉厨房的同志以后不要再提老王调走的事。”李主任马上去办了。

王诗书放心地走出了总理办公室，回到了他最热爱的厨房，那里是他直接为敬爱的周恩来服务的岗位，他的心踏实了。

王诗书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最盼过春节，一临近春节，就暗暗喜悦，因为辛苦一年的周恩来，只有春节才能充分睡两觉。同时，每逢过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必要请工作人员一道吃顿“团圆饭”。这时，周恩来和邓颖超都要亲自下厨房，做几样拿手菜。而总理最拿手、每次下厨必做的一道菜，就是红烧狮子头。这也是周总理特别喜欢吃的一道菜。

这个时候，是王诗书最开心的时刻。

三年困难时期，周总理坚持不吃肉、蛋、鱼类食品，狮子头便再也上不了他的餐桌。后来，王诗书知道这些情况后，伤心地又哭了好久。<sup>⑥⑦</sup>

1956年周总理还是把王诗书安排到北京西山，边工作，边休养。王诗书临行前依依不舍，邓颖超对他说：“你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尽管说！”王诗书表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晚年还会有这样幸福的生活，心里除了感到幸福，就是惦念着周恩来夫妇：“我真怕离开西花厅，自己又会跑回来”。邓颖超说：“西花厅是你的家，什么时候回来就回来看看，你不来，我们也惦记着你。”临别时，邓颖超特别送给他一件珍贵的礼物，那是周恩来老两口肩并肩手握手的全身合影照片，在照片的背面还亲笔签名。

王诗书离开西花厅后，周总理、邓大姐经常派人前去看望和送钱送物给他。王诗书却从未主动回西花厅，他不是不想念周总理和邓大姐，而是不忍心打扰他们两人的工作，怕给周总理、邓大姐添麻烦。想念他们了，就埋头多做工作。<sup>⑧</sup>

1961年9月，王诗书因突发心肌梗塞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到西花厅，周总理、邓大姐立即向她的秘书张元交代，给王诗书送去花圈，以表达哀悼和深切的缅怀。

今天，王诗书和敬爱的周总理、邓大姐已相继离开了大家。但是周总理、邓大姐和旺苍老红军王诗书的故事，总让人听后禁不住心潮澎湃，潸然泪下。周总理对同志的关心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真正让后来人终生难忘，永记于心。

他们都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单位：旺苍县国土资源局、利州区公安局）

## 参考文献

①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徐向前元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7月。

②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事务管理局：王诗书同志的基本情况（2000.8.17）

③飞舞的沙子1912新浪博客：沙可夫——剧作家、艺术教育、翻译家，2013年5月18日。

④周秉宜，《周恩来的家庭餐桌和饮食习惯——西花厅厨师安振常访谈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04月10日。

⑤霍英华，《周总理关心厨师老王的婚事》，《老人天地》，2002第04期。

⑥《周总理的三顿年夜饭：1961年是小米稀饭和包子》，人民网，2011年02月07日。

⑦《为周恩来服务36年的西花厅厨师 桂焕云后人谈“周家菜”》，中国网，2014年3月23日。

⑧程华，《周总理和他的秘书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400页。



## 编者按

四川，是一片红色的土地，富藏着丰富的革命遗址资源，弥漫着深邃的红色气息。以革命先辈的足迹、党史事件的遗址为载体，把红色人文景观和绿色自然景观结合起来，把革命传统教育与促进旅游产业发展结合起来新型主题旅游形式，即红色旅游，正异军突起。开展红色旅游，对于传承革命传统、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大有裨益，是党史工作‘存史、资政、育人’的一项重要内容，符合省委助推经济发展、全力精准扶贫、全面实现小康的号召。从本期开始，《四川党史》将立足省内红色资源，辐射到线路内的绿色景点，红绿结合，由点及面，逐步推出一批红色旅游景区线路的介绍，作为读者的出行参考。



赵一曼纪念馆

赵一曼纪念馆建于1960年，位于宜宾市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距市中心约0.5公里。馆舍系古典庭院式建筑。馆前中央是一尊汉白玉赵一曼烈士全身雕像。正门上方是朱德1963年亲笔题写的“赵一曼纪念馆”馆名。

展馆共设4个展厅，1个序厅，3个陈列展览厅。序厅主要陈列着朱德、陈毅、陈云、董必武、宋庆龄、何香凝、聂荣臻、郭沫若、张爱萍等领导人为赵一曼烈士的赋诗和题词。第一展厅展示了赵一曼的成长道路，展品包括历史照片及赵一曼阅读过的进步书刊、往来书信、赵一曼在报刊发表的文章复印件等。第二展厅介绍了赵一曼在东北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并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浴血林海雪原，打击日寇的光辉业绩，展品包括东北抗联战士使用过的武器、赵一曼在抗联使用过的藤箱、战友回忆录等。第三展厅展现赵一曼受伤被俘直到英勇就义的事迹。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山腰的翠屏书院

## 人物介绍

赵一曼（1905—1936），是著名的抗日民族女英雄。四川省宜宾人。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武汉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次年回国，在宜昌、南昌和上海等地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后，被派往东北地区发动抗日斗争，先后任满洲总工会秘书、组织部长，中共滨江省珠河县中心县委特派员、铁北区委书记。1935年秋，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11月间，第2团被日伪军围困于一座山间。赵一曼为掩护部队突围，身负重伤。后在珠河县春秋岭附近一农民家中养伤，被日军发现，战斗中再度负伤，昏迷被俘。日军对她施以酷刑，她宁死不屈，严词痛斥日军侵略罪行。1936年8月2日，在珠河被敌杀害，年仅31岁。



赵一曼故居

赵一曼故居位于宜宾市宜宾县白花镇一曼村一曼组，小地名伯阳嘴，占地面积600平方米，坐北向南，为晚清民居建筑，距宜宾县城80公里。

2002年被确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被中共宜宾市委、市政府确定为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赵一曼烈士牺牲地

赵一曼烈士牺牲地位于黑龙江省尚志市尚志镇一曼中学正门北侧一片绿林内。

1935年11月22日，赵一曼在候林乡养伤处被俘。

1936年8月2日，受尽敌人严刑拷打坚贞不屈的赵一曼从哈尔滨押回珠河，下火车换乘马车时，日本警佐林宽重拿出笔还想劝降，赵一曼看也不看一眼，当她看到街道两旁的群众，为了鼓励人民抗日的信心，激发群众的斗志，她激昂地唱起了自己最喜欢的《红旗歌》。马车到了小北门外的刑场，赵一曼下了车，两个特务要来架她，被她甩开了，她昂首挺胸向前走去，并举起带铐的双手高呼口号，敌人枪声响了，赵一曼壮烈牺牲。

1983年8月，由尚志县民政局拨款修建“巾帼英雄”碑（赵一曼殉难地标志），1984年9月，为纪念抗日英雄赵一曼烈士，尚志市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尚志县第二中学，命名为尚志县一曼中学。2007年尚志市委、市政府决定，县民政局投资百万元扩建赵一曼烈士墓园区，目前是尚志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 景点链接



蜀南竹海

蜀南竹海原名万岭箐，位于四川南部宜宾市境内，方圆120平方公里，中心景区44平方公里，共8大景区两大序景区134处景点，生长着楠竹、水竹、人面竹、琴丝竹等乡土竹子58种，引种了巨龙竹、黄金间碧玉竹等竹子300多种，共有竹子427种、7万余亩，植被覆盖率达87%，为我国空气负离子含量极高的天然大氧吧。蜀南竹海集竹景、山水、溶洞、湖泊、瀑布于一体，兼有历史悠久的人文景观。绝妙之处是有500多个山头上成片生长着7万余亩翠竹，千峰万岭峰峰是竹，岭岭皆绿，恰似线丘上隆凸起的一个竹类大盆景，盆景表层似一片绿色的海洋，四周丹崖绝壁，风景异常奇绝。

地址：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蜀南竹海景区

电话：400—8892—888

网站：<http://www.bamboos.cn/>



李庄古镇

李庄在四川宜宾市浩荡长江的南岸，因镇境有一天然大石柱俗名“李庄”而得名。李庄是一个人口仅有1.2万人的偏僻的小镇，错落有致的水阁楼、青石板铺就的狭窄的小巷、高大的木门槛和沉重的木门、一座座造型精美保存完好的古宅古庙，使它在全国早已声名遐迩，更使其成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所以，在我国又有“东有周庄，西有李庄”之说。



翠屏山

翠屏山位于宜宾市城西，海拔507米，因山势巍峨，树木苍翠，屏峙江岸而得名。翠屏山上森林茂密，是我国城市近郊第二大森林公园。山前有宽阔的石级直达山巅。两旁绿树扶疏，藤萝缠绕，繁花飘香。山上有唐代石刻千佛岩。“翠屏晚钟”是“宜宾八景”之一。每当丽日晴空，可从山顶俯瞰宜宾全城；极目远望，著名的“叙府三塔”一览无遗。

## 旅游贴士

### 参观线路建议：

赵一曼纪念馆——李庄古镇——蜀南竹海——兴文石海

### 宜宾市美食特产：

叙府龙芽、糟蛋、宜宾燃面、南溪豆腐干、碎米芽菜、红桥猪儿耙、双河葡萄井凉糕、宜宾炖鸡面、五粮液酒等

### 宜宾市旅游景点推荐：

梵王山、筠连大雪山、世界第一立佛八仙山石刻大佛、龙华古镇、夕佳山民居等



### 四川省举办全省党史业务培训班

6月24—26日，省委党史研究室举办全省党史业务培训班。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作了题为《关于党史研究和编写的几个问题》的辅导报告。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作了题为《学习掌握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科学指南》的开班讲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文星、副主任江红英、副巡视员宁志一、省发改委综合处处长陶剑锋分别讲授了《资政专报的选题及编写》、《党史资料的征集、〈执政实录〉的编纂与地方党史三卷的撰写》、《对开展地方党史专题研究的几点思考》、《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概况》。省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书记郭生春主持培训班讲座。

来自全省21个市（州）、173个县（市区）党史部门负责人和业务骨干以及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全体干部职工，共计240余人参加本次培训。

### 四川省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乐山巡开展展

6月25日，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纪念建党94周年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系列活动——四川省革命遗址普查成果乐山巡展启动仪式在乐山市体育中心举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中共乐山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王万锟出席会议并讲话。乐山市委书记唐坚到场参观展出。巡展活动为期一周，组织进机关、进学校、进景区、进社区和到区县开展巡展。

### 原省委老领导沈国俊接受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访谈

2015年6月30日，原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沈国俊接受中共德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的三线建设口述历史访谈。整个访谈过程围绕着四个主题进行：当年全国人民支援德阳三线建设的情况；三线建设给德阳带来了的发展变化；邓小平同志与德阳工业发展的关系；德阳能够成为国家发展的重点工业城市的原因。沈国俊书记希望德阳市能够借此机会，认真发掘和研究这段历史，重视党史工作，注意文献、影视资料的保存，更好地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

### 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成立

6月18日，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举行成立大会。达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张健、省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宁志一到会祝贺并致辞。

大会选举达州籍将军李中权之子、中国长征文化促进会副会长兼执行秘书长李洋为会长，达州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蒋吉平为常务副会长；审议通过了《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章程》（草案），选举了第一届

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新成立的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首批团体会员42个，其中北京4个、达州38个；个人会员69个，其中北京8个、达州61个。

达州市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会旨在深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研究，弘扬红军精神，传承红色文化，合力共振，努力推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 中共绵阳历史展览馆正式开馆

7月1日，中共绵阳历史展览馆正式开馆。展览馆位于中共绵阳市委党校新校区，占地面积351平方米，由中共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布展。展览馆分为主厅和辅厅，主厅由序厅、新民主主义革命展厅、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展厅、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展厅共4个部分组成，辅厅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怀绵阳以及一组大型浮雕墙组成。主厅精心选取了860多张图片 and 4万多文字解说进行展示，另外在触摸屏还收录了2200多张图片进行扩展充实。展览再现了绵阳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英勇奋斗，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

### 广元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党史图片开展展

6月30日，中共广元市委举行《党史光芒 照耀未来——广元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4周年党史图片展》开展仪式。参加开展仪式的有在家市级领导和获得省、市表彰的先进集体及先进个人代表。中共广元市委书记马华同志作重要讲话。图片展由中共广元市委党史研究室主办，广元市各县区委党史研究室协办，具体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英杰撷华四个部分，历时半年，经过多方征集、拍摄，从3000多张图片中精心遴选近700张图片，以时间为线，以重要人物活动为点，以重大事件为面，按照中共广元历史发展的主线索和大脉络，生动、形象、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元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 雅安市首批授牌8处“中共党史教育基地”

7月10日，雅安市委党史研究室8处红色文化遗址正式授牌为“雅安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他们是：雨城区上里镇红军石刻标语，名山区红军百丈关战役纪念馆，天全红军纪念馆，芦山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总司令部旧址，宝兴县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翻越夹金山遗址，荣经胡长保纪念馆，石棉县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和汉源县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展览馆。



#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吕世光一行来川指导工作



2015年7月9日-12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吕世光率第一研究部主任蒋建农、办公厅综合调研处处长陈亚杰来川指导。四川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范锐平会见了吕世光一行并交流了工作。

7月9日，吕世光副主任一行出席了在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会议室召开的《图说长征·红四方面军长征纪念画册》编辑座谈会。10-11日，吕世光副主任一行赴泸州中央红军石厢子旧址“鸡鸣三省会议”地和“四渡赤水”太平渡纪念地、古蔺双沙红军总司令部遗址参观考察，并为“鸡鸣三省”会议旧址颁授“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铭牌。12日，吕世光副主任一行前往成都大邑建川博物馆调研。

(省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文献处)

## 南充市举行朱德故居纪念园“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出席授牌仪式  
并为南充市党员领导干部作党性教育专题报告



6月26日上午，朱德故居纪念园命名为“四川省中共党史教育基地”授牌仪式在南充市仪陇县马鞍镇朱德故居纪念园广场举行。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王承先、南充市政府副市长单木真、市政协副主席傅宗洪、西华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王安平等出席了授牌仪式。授牌仪式由南充市委常委、秘书长曾勇主持。南充市级相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区)党委分管领导、党史研究室主任，仪陇县四

大班子相关领导、基层干部及群众代表共计200余人参加了仪式。

仪式结束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在南充市党员领导干部朱德故居纪念馆影视厅为南充市党员领导干部作了题为《攻坚克难、开创新路》的党性教育专题报告。

(省委党史研究室 宣教文献处)







达州市宣汉县洋烈新村水乡小镇